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朱舜水的民族志節及其海上漂泊  
Chu Shun-shui's National-Moral Integrity  
and His Overseas Journey

潘朝陽  
Chao-Yang PAN\*

**關鍵詞：**朱舜水、儒家、南明、華夏與夷狄、日本、東亞、民族主義

**Keywords:** Chu Shun-shui/Zhu Shunshui, Confucian, Southern Ming Dynasty, Huaxia and Yidi, Japan, East Asia, Nationalism

---

\*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地理系合聘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摘要

強調民族志節，是儒家的基本信念，或可以說是中國儒者承孔子的春秋筆法之教而有的民族主義。一般人以為儒家的嚴夷夏之防的民族觀，是一種狹隘封閉的意識形態：在邊疆外族入侵華夏的崩毀昏亂之時代，儒者一則必以身家殉道，一則必視外族為夷狄仇虜。

然而觀諸南明大儒朱舜水的抉擇，實則不然。他選擇效法微子去國，並且義不臣於女真而乘桴浮於東海，中年之後，在東亞海上漂泊十多年，晚年終能在日本長崎、江戶獲得安棲，並得到日本士子、貴族的尊崇以及師禮。朱舜水甚至以堯舜孔孟之國期待日本。

本文先敘朱舜水的民族志節之形態，再以地圖說明其東海之漂泊，同時敘述其海上生涯的際遇和心志。

## Abstract

One of the central doctrines of Confucianism is national-moral integrity, the Chinese Confucians' version of nationalism as influenced by Confucius' teaching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ome regard this form of nationalism as a kind of narrow-minded parochialism: a Confucian must be ready for martyrdom when confronting a foreign invasion and, moreover, must regard all foreigners as barbarians.

However, that was not the case for Chu Shun-shui, a leading Confucian in the Southern-Ming Dynasty. He emulated Wei-Zi, refused to accept the position offer from Jurchen regime and embarked on his journey overseas. After drifting around East Asia for more than a decade, Chu eventually settled down in Nagasaki and Edo and was held in high esteem by the local scholars and elites; he then began to expect another golden age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This article shall firstly determine the form of Chu's national-moral integrity. It then traces Chu's journey around the East China Sea, including the major events and his aspirations, illustrated with the aid of maps.

## 壹、前言

儒家的空間信念著重個人在家鄉、社區、國家的穩定座標，如同小農安土重遷，儒家立基穀物農耕文明而闡揚並且實踐井里共同守護安居的棲居理想。非萬不得已，儒家不會輕離家園故土而在天地之中漂泊流離或於異域他鄉尋覓暫時棲身之地。

在承平安和的時代，儒家的中心一直保有孟子規劃的井田藍圖，他們在農耕大地上以家廟、賢良祠以及文廟書院為中心來形構聚落空間，以此空間為基盤而建設了儒家理想的人文德教的生活世界。這樣的世界空間圖式，是從孔子、孟子一直到宋明儒家甚至當代新儒家的共同理想。<sup>1</sup>然而，在亂七八糟的昏暴末世，特別是異族入侵變亂的時期，儒家臨在他無可如何的世局，客觀外在的動蕩狀況，是他極度厭惡抗拒的，一旦脫離穩定的空間架構，陷入飄搖不定、居無定所的動蕩空間，此種情境，絕非出自喜歡自願，而乃是被客觀外在結構以及主觀內在信念的綜合情況導引演化。可是以他只是一介書生的身分，根本毫無力量加以改正，而基於他內心裡面主觀堅定清晰的信念，抉擇了某些行動，這些行動均是讓自身從原本平穩固著的空間架構中離去而有所變遷，最激烈的形式是：殉難而死，成為從此世界徹底消逝的殉國殉道型儒家，此形式的儒家譬如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謝枋得……等；又譬如明末的劉宗周、黃道周……等。最平和的形式是：遁隱於山林或街坊以待終年；或傳道於弟子以俟未來，此形式的儒家

1 北宋關中大儒張載嘗於家鄉試辦井田制的農村社會，惜未開始即病逝，當代新儒家梁漱溟亦曾在山東鄒平辦理儒家型態的鄉治，亦不成功。儒家此種理想圖式，筆者有文加以闡釋，均收於潘朝陽：《儒家的環境空間思想與實踐》（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或曰中國傳統儒仕由於為官而多離開故土，不是均在故土安居，故井田式理想主義的家園，實只是一種理念。此或誠然。但此只是彼等之身體行動之不得已，無法居停於故土，但其儒家的心靈卻必以孟子的井田式理想主義而恆存歸返家園故土之思，甚至無可如何之際，在死後亦多由其後人扶靈襯護遺骨而歸葬故鄉。只有在各種條件無法具備下，才會死而葬於異地他鄉，譬如南明遺民大儒朱舜水安葬於日本水戶，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均安葬於臺北；相反地，南明遺民大儒王船山，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則均安葬於他們的故土。唯無論如何，入土於他鄉的這些儒家都在文章中表達出家園故鄉的深情厚意。

譬如明末清初的孫奇逢、黃宗羲……等。另有一種則是幾以一生逃離奔逐漂泊飄搖的生命姿勢而活在天涯水涘、邊域異國的，此形式的儒家譬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王夫之、朱舜水。<sup>2</sup>

無論是激烈、平和或漂泊的形式，驅動他們做出生命大抉擇的根本信念就是儒家的「春秋節義」的民族主義思想。殉此節義而捐軀者，後世尊其為節烈型儒家；<sup>3</sup>遁隱講經傳道者以及流離遠揚於邊陲異域者，後世尊其為遺民型儒家。<sup>4</sup>

朱舜水是南明遺民型之大儒，本文主旨在於闡揚其民族志節之信念和實踐，並且以地空間圖式呈顯並且詮釋他自我放逐漂泊航海於東亞海上的大半生生涯。

## 貳、「微子去之」型態的民族志節

朱舜水名之瑜，生於明萬曆二十八年（西元1600年），逝於清康熙二十一年（西元1682年）。浙江餘姚人，寄籍松江。字楚嶼，到國外後，復字魯瑣，晚年至日本江戶，又號舜水。明諸生，明雖屢徵其為官，不就。後世以舜水稱之。<sup>5</sup>

2 顧炎武是江蘇崑山人，明亡，他自我放逐而隻身漂泊旅居於華北，包括河北、山東、山西、陝西一帶，最終卜棲於華山之麓的華陰縣，終身沒有返回江南。王夫之是湖南衡陽人，明亡，他奔逐逃亡於湖南、廣西、廣東一帶，最南還到過粵之肇慶、佛山，最後歸返衡陽，唯隱居於衡山之內或衡陽之西的山區裡的金蘭鄉，於其地築敗葉廬、觀生居、湘西草堂終其年壽。而朱舜水則是浙江餘姚人，長居於江蘇松江，後半生逃南明奸黨之迫害以及清軍之蹂躪，遠航於東亞海域，於日本長崎及越南會安兩港來回飄搖，最後安棲於日本江戶以終，無緣重返中國故土。

3 依儒者的殉國殉道而死而稱其為節烈型儒家，譬如忠事南明唐王隆武的黃道周（黃漳浦），兵敗被俘，清廷懇勸其降，道周決志不變其節而從容殉明殉道，諡「忠烈」。筆者撰有一文：〈黃道周的忠之思想及其實踐〉，宣讀於「海峽兩岸黃道周學術研討會」（廈門：廈門大學國學院，2011年6月12日）。

4 遺民者是指「改朝換代後，不在新朝之下為官的人」，見《中文百科大辭典》（臺北：百科文化公司，1984年），頁1292。如顧炎武、王船山、朱舜水、孫奇逢、黃梨洲等晚明清初的大儒都義不帝清，不作滿清官吏、不吃滿清俸祿，故稱為「遺民型儒家」。

5 見《朱舜水集》的〈出版說明〉（朱謙之整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舜水生逢南明亂世，漂泊東亞海上，成為離散於域外異邦的遺民型儒家。他痛國亡家散之深仇大恨，追索所以致此之故，撰有〈中原陽九述略〉一文，<sup>6</sup>其中區分為四節，曰：「致虜之由」、「虜勢二條」、「虜害十條」、「滅虜之策」。在文中以「逆虜」、「奴虜」惡稱滿清，顯其對滿清女真族的深仇大恨。僅舉「致虜之由」的話語明之：<sup>7</sup>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

逆虜入而迎刃破竹；〔……〕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是以逆虜乘流寇之訐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為「均田」、「均役」之說。百姓既以貪利之心，兼欲乘機而伸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合力一心，翹首俟后。〔……〕其心既變，川決山崩。以百姓內潰之勢，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財；以到處無備之城，怖之以狡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以相告語，誘我之眾以為先驅。所以逆虜因之，溥天淪喪。

豈知逆虜得國之後，均田不可冀，賦役不可平，貪瀆淫巧，慘殺荼毒，又倍蓰於搢紳之禍哉！今雖悔之痛之，無可為也矣！

據此，舜水顯然直指滿族是奸詐邪狡殘酷的族類，若依儒家傳統用語，就是「夷狄」。此種截絕區分的民族主義判別，與明末的顧炎武、王船山、黃宗羲並無差別。此乃遭異族入侵而漢民族逢亡國亡天下之慘變之故。

審視《朱舜水集》以及有關的敘論，可知朱舜水自我放逐於海上，終身反對滿清，且行文述及滿清之語句多有咬牙切齒不共戴天之恨，並非出

6 〔明〕朱之瑜：《朱舜水集》，頁1-13。

7 前揭書，頁1-4。

自他的家人有誰遭遇清兵之殺戮，其主因實屬一介儒士眼見這個關外異族之女真，藉機趁勢攻侵中土，竊我神器、殺我人民，明亡於以殺戮之方式而強行入主中土的異族，這不止是亡國更且是亡天下，換言之，文明中國居然守護不了自己的子民和大地；居然維繫不了自己的禮樂文制，而竟然敗亡於邊陲森林中的少數民族，這樣的亡滅之慘，才是朱舜水心中終身懷有大恨之原因。這一點是他的儒家春秋大義的民族志節之堅持。

然而，明季的官員和士子面對滿清亡中國的大變局，並非每人都採取相同的回應。何冠彪指出晚明士大夫遭逢國毀家亡的鉅變，在生死抉擇的關鍵處，往往發展出很複雜的狀況。有人慷慨就義；有人從容赴死；有人遠引高蹈；有人隱居遁藏；有人漂泊流離；有人屈膝求榮……。其複雜性，何氏均作了詮釋。<sup>8</sup>

朱舜水在這些回應的類型中，屬於遠引高蹈者，其遠引高蹈是一走就走入東亞海域，且從此度其漂泊流離的後半生的異鄉為客的生涯。而其所以有這樣的命運，實則逃離兩大層羅網，一是女真滿清；一是昏君權奸，換言之是依據「正君臣之大義；嚴夷夏之大防」的「春秋節義」的標準；他是以「逃離」(escape)的方式來抗拒、否定腐朽的南明朝以及異族清朝的正當性。換言之，就是全其身命而遠走於另一個空間來彰著他的儒家春秋節義性的民族志節，此即不以死殉國而是「乘桴浮於海」，在東亞海洋的漂泊中尋得心志之重新安頓。

古市務本問：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雖微子、箕子、比干三人之行相異，皆稱仁。想夫三賢之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各雖謂得其本心。微

---

8 關於明季士子和明臣如何抉擇生死及其或明或晦的各種理由，請閱讀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

子去，所以稱仁，自古雖多論說，不解稱其仁之意。蓋三人之行，各隨時安心，故稱其仁否？庶幾仔細告焉。<sup>9</sup>

古市的提問出自《論語·微子》的第一章：「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章朱子如此詮釋：「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sup>10</sup>朱子之意乃指微子為了宗祀之繼，故而逃離；箕子比干勸諫激怒紂王，故一被囚為奴，一則被剖心而死。孔子以仁美稱三賢之故乃因三賢均懷「至誠惻怛」的仁心。換言之，朱子認為孔子之所以以仁人稱頌微子、箕子、比干，乃依據此三賢的仁心義行。

古市問話中的敘述，顯然源自朱子之注，但在其說法中明顯有其針對性，此即以「微子去之」來比附朱舜水之逃離中華而赴東瀛。古市指出微子遁逃而未死未辱，如此亦被孔子稱仁，然而歷來對此多有不解，不去殉節卻逃跑存活，何以亦能稱仁？難道放棄職責而逃離亦可心安？這是轉彎地探問逃離中國而來日本的朱舜水是否心有所不安。

此種逼問可謂直接了當而不客氣。朱舜水回答：

「殷有三仁」之論，致疑於微子之去，不得為仁，此局於一隅之見也，必以一死為忠為仁也。夫臣子之事其君，居恆不能盡啟沃之道，不能竭諫諍之誠，使其君榮國治；迨夫社稷淪亡，徒以一死塞實，其心必曰吾忠也，必曰吾忠如是足也，是乃忠臣之罪人耳！安得謂之仁哉？〔……〕微子之出，蹈危履險，艱難困苦，不言可知。〔……〕其後武庚誅而微子封於宋，備三恪以奉湯祀，綿已絕

9 〔明〕朱之瑜：〈答古市務本問二條〉，《朱舜水集》，頁378-380。

10 〔南宋〕朱熹：《四書集注》。

之祚於七百載，獨不可謂之仁乎？仁也者，於心無所不盡，於義無所不安，至誠惻怛而無憾焉者也。三仁者，死者易，而奴與去者為獨難；死者徑行直遂，而奴與去者之心為更苦。究竟顛危而不失其正，誰得謂之非仁乎？<sup>11</sup>

舜水這一大段的回應看得出來他的激憤和嘲諷。關於激憤處，是他特別強調微子為了存續殷商宗祀，所以必須出離逃亡，且嘆頌說「蹈危履險，艱難困苦。」其之所以如此突顯微子以及箕子，乃是他以自己的漂泊離散的命運與微子、箕子相比照而認同。與其說朱舜水喟嘆微子去國之艱危，倒不如說這乃是他假借古賢而夫子自道，蓋因憑一時激越高亢之氣而殉死，不過就是一死而已，一了百了，無有牽掛，可是為了大道之傳承不令其滅絕，如同微子、箕子忍辱忍悲而活著，這樣漂離邦國寄居異土而孤寂存活的朱舜水才真正是萬分艱難。

舜水在另一文中也表達出他在崩裂國局中不能也不願一死了之的觀點：

敝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喪於逆虜。使瑜蒙面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為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辮髮髡首，狐形豕狀，以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徵辟，因見天下大亂，君子道消，故力辭不就，不受君祿。而家有父母未襄之事，義不得許君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尚禮義，是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

今瑜歸路絕矣！瑜之師友三人，或闔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瑜之祖宗墳墓，家之愛子女，皆在故國，遠託異域，豈不深悲！祇欲自全忠義，不得已耳。<sup>12</sup>

11 〔明〕朱之瑜：〈答古市務本問二條〉，《朱舜水集》，頁378-380。

12 〔明〕朱之瑜：〈上長崎鎮巡揭〉，《朱舜水集》，頁37-39。



這一段文字中朱舜水揭示了他逃離中國且又沒有殉明之原由，乃是其祖、父、兄皆曾入仕，受明廷的俸祿，且又屢受誥贈，如何可以寡廉鮮恥媚事仇虜？因此必須逃離避難；且何以不能死？乃是因為父母健在而有待盡孝，故不可死。其實在故國的祖宗墳墓以及妻兒子女均讓他日夜牽掛，何嘗要如此漂泊流浪棄家不歸？乃是因為他的師友有全家自焚殉節者，有臨刑賦詩而被仇虜殘戮者，舜水內心悲痛不已，認為他之自我放逐於海域，實是自全忠義的抉擇，否則無法給死難師友以及邦國父母妻子交代。

朱舜水沒有擇死而是擇逃，其自我的認同是取法乎微子的。關於〈微子〉章句，與朱舜水同一時期的王船山則如此訓義：

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賢而不立，箕子曾欲立之，紂忌焉。微子恐紂之賊己而傷恩，不可留，不可死也，乃行遁於野，其後殷祀賴之以存。箕子以懿親而為父師，知殷之將亡而不忍去，佯狂，而紂奴之，不恤辱焉。比干則以去者去，奴者奴，紂終不悟，危言以諫而見殺。孔子論殷事而稱之曰：三子之行不同，而心一也。不忍遺其親，不忍陷其君，去國而不憚奔竄之勞；為奴而不恤戮辱之甚；盡諫而不惜斧鑕之加，其自靖於心也，皆以自獻於先王也。使三子而欲獨善其身，而怒棄宗國，亦何至如此之惓惓乎！故於三子可以觀仁焉。<sup>13</sup>

從此段文字看來，船山似乎只就朱子的意思而再加推衍詳說，可是朱子並未遇宋亡慘變，亦未曾與女真或蒙古異族血刃相對而出生入死，船山則不然，他與其父兄家人都遭到張獻忠的威逼脅迫，亦曾逢滿清的追殺，他自己參與了對抗女真的民族戰爭，也遭到奸臣的構陷以及吳三桂的要脅，有幾次差一點死難而終得存活，前半生窮於奔亡求活而後半生則隱藏遁逃於湘西山林之中不與人世來往。此種命運有與朱舜水相類同者，就是自我放逐的漂泊離散，一在海洋而一在山林。可是船山卻同時肯定「殷之三

13 〔明〕王夫之：《四書訓義·論語》，收於《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第7冊，頁938。

仁」，無論死節、佯狂、逃離均平等如一是仁人志士。所以，船山在其史著中為晚明和南明三型仁人立傳。<sup>14</sup>

與王船山對比，朱舜水則顯然對於晚明、南明的死士多有嘲諷。上引文中，他譏評而言「夫臣子之事其君，居恆不能盡啟沃之道，不能竭諫諍之誠，使其君榮國治；迨夫社稷淪亡，徒以一死塞實，其心必曰吾忠也，必曰吾忠如是足也，是乃忠臣之罪人耳！安得謂之仁哉？」此句斥責者其實是具有明顯對象的。

茲引相關問答而明之。

林春信問：「崇禎年中，巨儒鴻士，為世所推者幾人？願錄示其姓名。」

（朱舜水）答：「明朝中葉，以時文取士。時文者，制舉義也。此物既為塵飯土羹，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如鄒元標、高攀龍、劉念臺等，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未聞所謂巨儒鴻士也。巨儒鴻士者，經邦弘化，康濟艱難者也。」

〔……〕

問：「相成水火，其實如何？」

答：「水火玄黃之戰，道學家與文章之士互相攻擊，亦如宋朝程氏、蘇氏互相詆譏，朝廷之上，舌戰不已，遂使國家被其害耳。」<sup>15</sup>

上述舜水答林春信之言論，恐不免過偏，明朝局勢敗壞其來有自，主要源於帝王專制下的政治之黑暗敗壞與兇殘之本質。關於傳統君主專制政治的漆黑殘酷本質，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和徐復觀兩位先生之著作詮論既深且真。<sup>16</sup>明亡何嘗與東林領袖鄒元標、高攀龍、劉念臺三儒相干？何況與東林

14 此可讀《永曆實錄》、《籙史》，都收於《船山全書》，第11冊。

15 〔明〕朱之瑜：〈答林春信問七條〉，《朱舜水集》，頁383-384。

16 牟宗三與徐復觀兩位當代新儒家重鎮均對傳統中國的專制政治有深刻的批判論述，兩人的觀點可見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政道與治道》等書，均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兩漢

黨爭執的團體勢力，豈是所謂「文章之士」？東林的對手以及最後將東林徹底摧殘的那股極大勢力，根本就是以昏君為核心以佞倖為外圍的奄黨！朱舜水將北宋時期明道伊川兄弟和蘇門三傑之互相看不順眼之前史拿來比附，更顯得異質他類對比之邏輯錯謬。

高攀龍人品甚高，不容輕侮，他在林下或京師講學豈能以「迂腐」譏訕？學者古清美對高攀龍有非常高的評斷：

景逸（即攀龍）從事心性義理之學，一生的功力正表現在這患難生死的關頭；從心的涵養修持，上證於天命流行的性體，境界之高、力量之堅，不是富貴貧賤，亦不是刀鋸鼎鑊所能動搖，其所謂「真無生死」，不是佛家的了生脫死之謂，而是義理之學所到達的最高境界，其發而為節義，不但是心性之學所凝成的冰雪清操，更是其守持道德傳統的義理在此關頭的真實呈現。<sup>17</sup>

古氏的評斷，應屬實論，因為高攀龍的生命實踐確實如此，此即可以其晚年自我終結的方式和態度獲得證明。朝中奸佞和權奄羅織罪狀而慘害東林儒者之後，高攀龍奉顧涇陽、涇凡、錢啟新、薛元臺、安我素、劉本孺從祀道南祠。奸佞崔呈秀構陷攀龍，緹騎下東南逮人，於是高攀龍從容留遺疏且又書一封予友人。疏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書則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遂自沈於池。古清美結語說：「一個講義理之學的學者、忠臣，在現實中漫天邪惡的狂焰下，無法挽救此時為利欲毒殺了的政治和國家，懷抱著他的道德理想，將他的生命作膏火，去點燃這盞長明不滅的正義和真理之燈。」<sup>18</sup>

思想史》等書。

17 古清美：《顧涇陽、高景逸思想之比較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頁46。

18 前揭書，頁46-47。

依上所述，不得不說朱舜水對東林儒家不免心存偏見。朱舜水自己說的巨儒的標準是「經邦弘化、康濟艱難」，高攀龍的人格和實踐就是如此，非巨儒乎？講正心誠意，怎麼會「大資非笑」？

另外一位東林大儒劉宗周亦殉明絕食而死，亦屬講學論政的明儒，朱舜水亦譏諷之。其實劉宗周人格和學問甚高潔。學者東方朔說到劉宗周事寡母至孝，對妻子恩敬，對親友友愛，且自己的生活十分儉樸清貧，終身未嘗以寸帛加體，當時法紀凌夷，各級官僚動輒車馬肩輿，劉宗周卻獨乘一匹羸馬，有人以為只是沽名釣譽，藉機入其臥室問疾，乃發現阜幃縷縷打結，補丁成串，破被一床舊爛不堪。再者，劉宗周一輩子沒有為子孫購置田一畝、屋一椽。這樣潔淨自守的劉宗周為官耿直正義，對於閹黨及奸宦從來不假辭色。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西元1645年），南京城破，弘光帝被殺，同年六月，杭州陷，潞王降，明室土崩魚爛，大勢已去，眼見中國竟亡於夷狄，痛無力迴天，遂絕食殉國。東方朔特別徵引劉宗周絕食離世之際答清將李羅之招降書之文：

遺民劉宗周頓首曰：「國破君亡，為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尚事遷延，遺玷名教，取議將來？宗周雖不肖，竊嘗奉教于君子矣。若遂與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以鈇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言不再。」<sup>19</sup>

東方朔慨嘆曰：「宗周一生『簡點過端』、『銷融習氣』，從而鑄就了『春色梅花』的人格形象。他雖在朝為官，忠誠竭力，無奈，朝廷痼疾贅疣，積深難治，惜哉！『志完死後交游薄，憔悴征衫已淚沱』，嗚呼！」<sup>20</sup>

如此高貴而令世人感動尊敬的儒士儒臣，豈是「迂腐不近人情」？舜水之譏責賢者，或稍過矣。

19 [明]劉宗周：《劉子全書》，卷40，〈年譜〉，清順治二年條。

20 東方朔：《劉宗周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2-28。

劉宗周的儒學境界，亦為當代新儒家大師牟宗三先生推崇肯定。牟宗三說：

南宋胡五峰承北宋前三家（濂溪、橫渠、明道）首言「盡心成性，以心著性」之形著義，不走伊川、朱子之路也。象山興起，本孟子明本心，辨端緒之得失，遂扭轉朱子之歧出，而歸於正。陽明承之言致良知，使「明本心」更為確切可行者。至蕺山「歸顯於密」，言慎獨，明標心宗與性宗，不期然而自然走上胡五峰「以心著性」之義理間架，又而著《人譜》以明實踐之歷程，如是，內聖之學、成德之教之全譜至此遂徹底窮源而完備。〔……〕自實踐規模言，象山提綱挈領，略舉端緒；至陽明而較詳；至蕺山而尤詳。然而學者用心亦可迴環參用，不可執一。如若順蕺山《人譜》作實踐，覺得太緊、太清苦，則可參詳致良知以稍活之，又可參詳象山之明本心以更活之。反之，若覺得象山之明本心太疏闊，無下手處，則可參之以致良知，如若覺得致良知仍稍疏，則再詳之以《人譜》。<sup>21</sup>

牟宗三這段話點出宋明儒學的存有論工夫進路有一個系統是從北宋濂溪、橫渠、明道起始而由南宋胡五峰提揭的「盡心成性、以心著性」，此路有別於伊川、朱子的工夫進路。再加上南宋陸象山直接從孟子而明本心，亦與朱子大有不同，此路至陽明致良知而大明。牟宗三判教將這兩條著重道德本心具體化的進路歸結匯聚於劉宗周，牟宗三認為在內聖之學和成德之教的學術思維之論述方面，從胡五峰至劉宗周乃是由簡約至完備，而身心的修養進路，則是到劉宗周愈重緊張和清苦，宜返陽明、象山而寬活之。<sup>22</sup>

依牟宗三的詮釋，可證劉宗周回應了時代的儒學之風，而能於道問學這一層，針對其時學界之空疏與輕狂而有了更嚴肅更深沈的省思，建立了其緻密論心性的劉蕺山形態的儒學；而於尊德性這一層，更針對其時奸闊

21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第8冊，頁437。

22 此段所述，同前揭書。

佞倖的敗亂政局以及放肆張狂的文人社會習性，提出敬謹莊肅的修身養性工夫論。朱舜水對於這樣的大儒怎麼會產生如此相異的評斷？牟宗三嘆息而曰：

明亡，蕺山絕食而死，此學亦隨而音歇響絕。此後，中國之民族生命與文化即陷於劫運，直劫至今日而猶未已。噫！亦可傷矣！<sup>23</sup>

當然，朱舜水沒能親見滿清兩百多年統治，讓孔孟之德慧之學淪喪異化的國族悲劇，但是牟宗三「噫！亦可傷矣！」的嘆息，卻有其國族德慧之命不絕如縷之悲見，而這個悲見，確有其時代親歷的體證，他認為劉宗周是國族慧命斷絕於夷狄之最後象徵，乃有其深刻的教訓警戒之義在焉。朱舜水似乎在此點亂世危機之關鍵處過於輕忽。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如是說，即朱舜水雖然強調且說明自己何以不以身殉明朝而選擇了逃亡出離漂泊之生涯，但他對於高攀龍、劉宗周這兩位東林大儒的死，卻有不太正確的批判，須知高氏是殉於「正君臣之大義」；劉氏是殉於「嚴夷夏之大防」，都是「春秋節烈」，兩位殉難型儒家與遺民型儒家的朱舜水，其人生結局固有不同，可是其合乎儒家之春秋節義，卻都一致，惜乎朱舜水未能持平而論。

我們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依人之潛意識而究之，朱舜水雖是大儒，卻亦是有血肉之軀的人，故不免有身心壓力，他不為明而殉節，卻離別雙親妻子而泛海逃亡，此生離就是死別，總在心靈深處有所大痛與難安，對於己身未能殉死，乃有一番說辭已見於前，而針對相較於他之未死而慷慨或從容赴死的一些儒士儒臣，則不免會有一些過激的譏諷。

再者，我們亦可就朱舜水是在怎樣的情境之下買舟出亡海上加以明瞭。朱舜水是終身不接受明朝朝廷的任予官職的，換言之，朱舜水一直是以民間布衣儒者而在社會上活動，他並非明朝官吏。這一點特性確是讓他

---

23 前揭書，頁438。

深覺足以自我肯定的境界。我們嘗試依據梁啟超撰述的《朱舜水先生年譜》<sup>24</sup>（以下簡稱梁著《年譜》）來循序弄清楚朱舜水究竟有多少次被任命而均加以拒絕。茲擇錄《年譜》相關章句：

戊寅（崇禎十一年，西元1638年）先生三十九歲。是年，先生以恩貢生貢於禮部。〔……〕據〈行實〉：「崇禎某年，〔……〕舉『文武全才第一名』，薦於禮部。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幕府辟為監紀同知，不受。尋擢恩貢生。〔……〕」<sup>25</sup>

此所謂〈行實〉，即今井弘濟、安積覺同撰的〈舜水先生行實〉。在該〈行實〉中如是說：「年至四十，欲棄舉子業，退安耕鑿；諸父、兄弟，愛其器度可大用而不許。於是每逢大比，徒作遊戲了事而已。或有勸顯達者，則恬然不省。崇禎某年，提督蘇松等處學政、監察御史元某，舉『文武全才第一名』，薦於禮部。〔……〕」<sup>26</sup>依此，則舜水的本心根本不想應舉為官，是被父兄長輩勸迫而以遊戲文字的態度去應付而已，卻被主試大員元某賞識而舉「文武全才第一名」。旋授監紀同知，朱舜水拒絕不受。於是朝廷擢為恩貢生。

癸未（崇禎十六年，西元1643年）先生四十四歲。十月，鎮守貴州等處總兵官方某辟監紀同知，不就。（見〈答源光國問履歷〉。方某即方國安。）

甲申（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西元1644年）先生四十五歲。南都初建，江南總兵方國安薦先生，奉詔特徵，不就。

24 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收入《朱舜水集》，頁644-729。梁氏所纂修之《年譜》，有評者謂其中難免有些錯誤。但至現階段，並無另外更精確詳實的朱舜水之年譜可以超越、取代，故梁氏纂修的《朱舜水先生年譜》，相對之下，依然值得運用。

25 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收入《朱舜水集》，頁651-652。

26 〔日〕今井弘濟、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收於《朱舜水集》，頁612-624。

乙酉（弘光元年，隆武元年，清順治二年，西元1645年）先生四十六歲。正月，再奉詔特徵，不就。四月，就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鎮東伯方國安軍，不拜。於是閣部勳鎮科道，交章論劾，謂「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先生星夜遁逃海濱。（據〈供役紀事〉。〈行實〉云：「此時左良玉之子夢庚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免於逮捕。既而自舟山至日本。」）<sup>27</sup>

依此，南明已是一個亂七八糟的政權，三番兩次授官位予朱舜水的人，並非皇帝和朝廷，而是當時的大軍閥方國安。深具儒家志節的朱舜水豈會如此荒唐無恥地從大軍閥的手上接此官位？他在〈答源光國問先世緣由履歷〉一文中自己解釋了不受南明官位的理由。

凡朝廷徵聘，不論彙徵特徵，不論有無差官，禮當先下撫按；撫按抄騰詔旨，星行所屬；各省行布政司，兩京移會京尹，兩直隸行道府，預備羊酒彩幣，重者欽差親賚玄纁，迎入布政司及府，或者竟賚到門。現任文武大小官員，齊集開讀，敦趣就道。本官生處士，或有抗志，尚煩周折。此時朝政紛然，百事草率，如此盛舉，不考憲章。初下南京，繼至蕪湖，第三次亦就南京，不關撫按衙門。瑜故得直行其志。差官理屈，不能迫促。<sup>28</sup>

原來明朝聘任官員，依制，乃是以尊貴的大臣之禮而敦崇有加地迎聘的。舜水科考的成績是「文武全才第一名」，卻在那個囂亂紛紛的時代中，遭受粗魯軍閥無端無禮的侮辱。我們或許可以如此想像：就是差一個小兵到你家門口大呼小叫，丟給你一封奇怪的信函，信紙內容是叫你作這個官那個官。相信朱舜水除了感到莫名其妙之外，會深深覺得萬分屈辱憤怒。梁著《年譜》對於不就官位而最終買舟出亡的朱舜水自己的說辭有如下三段引文：

27 以上引文俱見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收入《朱舜水集》，頁653-656。

28 〔明〕朱舜水：〈答源光國問先世緣由履歷〉，《朱舜水集》，頁350-353。



〈答安東守約雜問〉（卷14葉2）云：「老師徵辟不就，其義如何？」答：「不佞事與吳徵君（案：康齋先生與弼也。）極相類。薦吳徵君者石亨，權將也；薦不佞者方國安，方擁重兵，有寵於上也。吳至授六品官而辭之；不佞兩次不開讀，而即授四品官，不拜，其間稍異耳。吳徵君時，當國者李相公賢，賢相也，英宗復辟之後，賢主也，尚有可就之理。徵不佞時，當國者為馬士英，姦相也。彼時馬士英遣其私人周某，同不佞之親家何不波（原注云：「進士，名東平，即小女之舅。」）到寓再三勸勉，深致慇懃。若不佞一受其官，必膺異數，既膺異數，自當感恩圖報。若與相首尾，是姦臣同黨也。若直行無私，是背義忘恩也，是舉君自伐也。均不免於君子之議，天下萬世之罪，故不顧身家性命而力辭之。不然，不佞亦功名之士，釋褐即為四品道官，兼京職，監軍四十八萬，與國公大將軍迭至賓主，豈不煊赫，而乃力辭之乎？要知不佞見得天下事不可為而後辭之，非洗耳飲牛、羊裘釣魚者比也，亦非漢季諸儒閉門養高以邀朝譽也。」

〈答源光國問履歷〉（卷13葉5，見352頁）云：「之瑜少壯家修，本志功名鍾鼎，痛憤憚壬構禍，立見社稷傾頽。幸邀兩次特徵，雖百年鉅典，遠勝於科目貢舉，然顛廈非一本所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豫籌於曲突之先，支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辭遜，原非欲沽名養高。」

〈答小宅生順書〉（卷8葉6，見311頁）云：「僕素民物為懷，綏安念切，非敢以石隱為高，自矜名譽。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傾之廈。近則為他人任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故忍死不為耳。」<sup>29</sup>

29 以上引文俱見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收入《朱舜水集》，頁654-655。

方國安、馬士英都是當時的大奸人大惡黨，他們之知有朱舜水，是由舜水女兒親家何東平之引介，何氏正是庸闇勢利之小人，是馬士英、阮大鍼佞黨的同志，後來降清，以致舜水的唯一愛女朱柔端憤鬱以死。依此，我們得知朱舜水堅拒受官且隻身逃離家鄉泛海求去，且從此與親人永訣之故，乃是一不願與奸黨同流合污，一則不願無價值無意義地被奸黨殘害。

再看一段梁著《年譜》：

五月初九日，清師渡江，初十日，福王出走。十五日，清師入南都，先生亡命至日本。（啟超案：〈安南供役紀事云〉：「數月不見緹騎。已後遂有逆虜之變。之瑜不別家人，隻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紀事〉作於丁酉年（西元1657年），云十三年，則先生初至日本，當在乙酉也。又案：〈與男大成書〉云：「我以兄弟責善，又以滿朝上疏彈劾，網羅密布，立刻擒拏，一時倉皇逃竄，不能入城與汝伯父作別，至今悔恨無已。細案情節，似是被徵時其兄頗以出山相督促，故云責善。先生亡命，伏海濱數月，旋聞南京之變，遂奔日本。蓋自是年四月以後，即不復與家人見面矣。」）<sup>30</sup>

梁氏徵引兩種朱舜水的文章辨明了舜水先是不受南明奸佞的授官，遭到將被擒拿迫害的威脅，且又困於其兄的出山逼促，因而孤身一人竄匿於江蘇松江海邊躲藏，旋又聽到清兵已陷南京，弘光朝覆滅，為了不事仇虜夷狄，因此毅然乘船出亡東海，開始了他奔波東亞海域的漂泊流離的遺民儒家的生涯。依此，可證朱舜水的自我放逐亦是合乎春秋大節，此即是在離亂之世代中對於「正君臣之大義，嚴夷夏之大防」而義無反顧的判斷和抉擇。

總之，以朱舜水的儒家觀點和信念而言，他基於激憤之心，面對晚明東林儒者如高攀龍、劉宗周所引發的無助於天下國家存亡之道德性高標空言，甚為反感，因此對於為明而殉節之大儒，難免生發有失公允恰當的批

30 前揭書，頁655-656。

評和譏詈。然而嚴辭責備明末心學家的儒者實不止朱舜水一人，顧炎武、王船山這兩位自我漂泊之遺民型大儒也同樣對於明末心學家有甚不客氣甚為偏激的求全責備。最有意思的是此三位大儒都是布衣平民。筆者認為由於這布衣平民的儒家身分和立足點，讓他們自己可以認同是孔孟（孔孟是布衣平民儒家典範）的同一形態，因此可以針對這些在朝為官而負有政治責任的儒臣儒吏，要求彼等必須負擔較高層級的道德和政治責任，因而對彼等提出嚴厲的責難。且由於是一介布衣平民之民間儒家，因此明朝之淪亡，朱舜水自認為並非他這樣的庶民百姓需要負責，所以，當奸黨欲圖迫害他或被視為「醜虜」的關外女真大軍已經打到南京城時，舜水當然可以效法微子去國或者乾脆實踐孔子乘桴浮於海的企盼和想像，在其良知的判斷，他必然認為十分正當。

### 參、東亞海域漂泊航海圖示

由於地理區位的影響，朱舜水不能如王船山深遁家鄉的湘西老林深山；不能如顧亭林遠走西北而寄居於華山之麓；也不能如孫奇逢墾居於豫北蘇門山結寨講學。朱舜水既是海邊的餘姚人且又長居於距近海口的松江，故熟習於海洋和航海之事，因此在「孔子乘桴浮於海」、「微子去之」的儒家志節下而泛海漂泊於東亞之洋。本章依梁著《年譜》所述，將朱舜水在東亞海域漂泊的空間路線繪製為空間圖示且續以詮釋，依序呈現於下：<sup>31</sup>

乙酉年（清順治二年，西元1645年），福王在南京即帝位，年號弘光，南明政權由此始。然而，史家凌雪如此說：

31 雖然梁啟超編纂的朱舜水年譜不免有些錯誤，但正如筆者本文前注所言，並無更佳的朱舜水年譜可取而代之，筆者只能使用梁著來表顯朱舜水之東亞海洋的航海空間，大體上，依梁著繪製的航海程序，在整體東亞的時空尺度之次序上，其所記朱氏的東亞海上航行的時空架構，是合理的，故可以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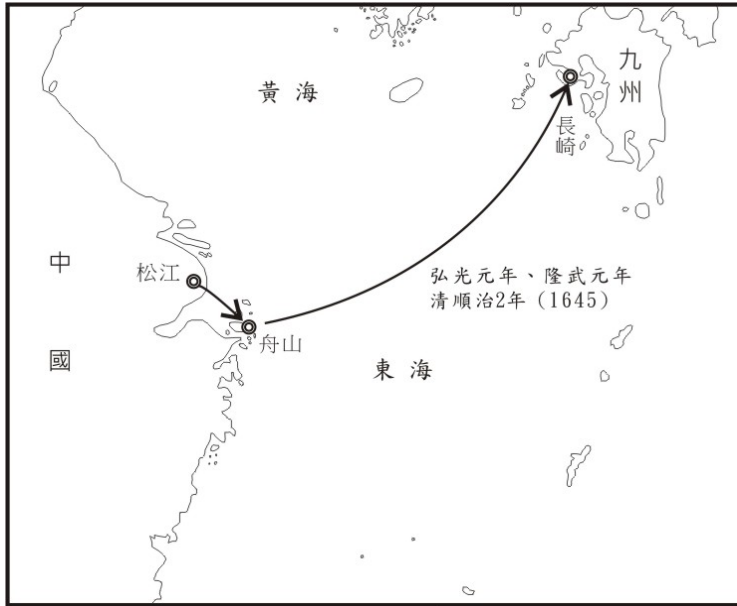
哂園嘗論明之亡也，始於羽黨，成於奄豎，終於盜賊。南渡繼之，小人得志，借朋黨以肆毒，合奄豎以固寵，假盜賊以張威；而廟堂昏庸，酣歌勿恤；忠貞黜落，貪黷橫肆；紀綱倒置，是非混淆；以致穴中自鬥，貽敵以漁人之利焉。〔……〕當其時，坐而平章者，不乏道德譽望、忠諒誠悃之儒；其捍禦邊圉、綢繆外海者，亦多英達敏練、遺艱投大之材。劉、黃、姜、高、史、瞿、何、堵諸君子者，皆學究天人、忠貫日月，常變不渝，文武互濟，亦可謂祖宗之留遺王國之楨矣。乃好爵虛糜、大權不畀，或外而不內，或尊而不親，終於一木支傾、九泥塞潰，碧血青燐，抗忠自信。悲乎！悲乎！<sup>32</sup>

上引凌雪論明亡之故，正在於奸黨聯合奄豎而敗亂國政，且君王昏庸無德，朝廷綱紀渙散，貪瀆橫肆、自鬥不休，雖然亦有一些文武忠臣，奈何死的死、走的走、閒置的閒置、隱居的隱居。囂張狂肆於弘光朝者，如馬士英、阮大鍼、鄭芝龍輩，極盡其魑魅魍魎之窮凶極惡的害人伎倆，聯手將弘光朝敗壞摧朽。

這種腐爛政權居然召朱舜水出來任官，舜水焉能接受？奸宦們準備予以逮捕殺害，舜水於當年連夜出海逃亡舟山；五月初九日，清軍渡江，初十日，弘光出走，十五日女真人入南京城，舜水從舟山渡海遠航日本長崎，時年四十六歲。<sup>33</sup>其航海空間圖示，見圖一。

32 〔南明〕凌雪：〈評言〉，《南天痕》（臺北：大通書局，不註出版年份），頁3。

33 〔明〕朱之瑜：《朱舜水集》，頁654-656。



圖一 朱舜水46歲逃離大陸到日本長崎

《年譜》於「丙戌（魯監國元年，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西元1646年）先生四十七歲」條曰：「是年，先生至安南。蓋先生初亡命日本，彼中海禁方嚴，不容外人，故轉徙至安南也。」<sup>34</sup>

彼時德川幕府行鎖國之政，朱舜水抵長崎不得上岸，必須離境，而此中所言「安南」，實則今越南中部順化之南的會安古城。其由長崎坐船遠航會安的空間圖示，見圖二。

關於越南的會安古城，湯錦台在其《閩南人的海上世紀》一書中有深入的說明。<sup>35</sup>湯氏指出宋元時代，極力發展海外貿易，因此鼓舞了中國東南沿海之民向海外拓殖貿遷，特別是泉州商民，大批南下而散布在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印尼群島和婆羅洲的南海諸國港口，與早已活躍當地的波斯、阿拉伯和印度商人會合交易。因此從泉州、廣州沿著越南的海岸南行，再穿越暹羅灣直達馬來半島東海岸的航路沿線，出現不少華商興貿通

34 前揭書，頁656。

35 湯錦台：《閩南人的海上世紀》（臺北：果實出版公司，2005年），頁76-81。

商的據點。再西延到馬來半島西岸，或南延到爪哇、蘇門答臘沿岸港口，通達印度洋的前沿，均有不少華商貿易。

在這些港市和城邦當中，又以林邑浦，也就是越南的會安統領風騷。會安位在越南中部秋盆河北岸近海之處，很早以來就是華船從泉州、廣州航行南海諸國的一個重要中轉站。它繁盛的貿易，支撐了古占城國的存在與繁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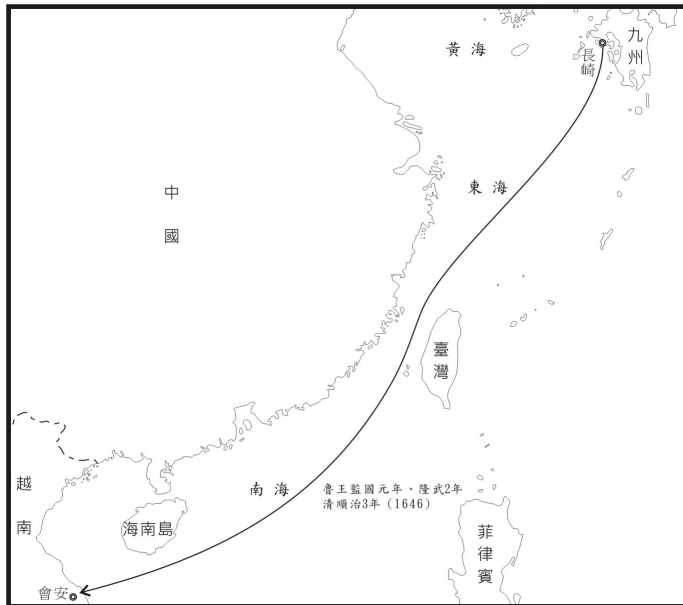
占城國原稱林邑，後改稱占婆，宋、元、明三朝，則以占城稱呼。原是秦代象郡林邑縣所在地，漢朝為象林縣，屬日南郡。到東漢末年獻帝初平三年（西元192年），占人脫離中國，自立為國，成為最早出現於越南中南部的國家。因其近海的有利地位，印度商賈很早就到此貿易，久受婆羅門教的影響，早期的宗教、文字、曆法都源自印度。

大體上，中國對占城國的貿易，宋朝以後開始興旺發達。泉州以對外貿易的地利之便，出海船舶也以占城為其重要停靠地，每年冬季南下，「自泉州至本國順風舟行二十餘程」，等到南風季節再行回國。到占城國就是到會安。

會安的重要口岸地位持續達數百年之久，十六、七世紀歐洲人東來後，更大放異彩，成為中、日和歐洲商人匯聚的一個重要國際港口。

在同一本書中湯錦台又提到在會安出土的中國陶瓷器，見證了十六世紀末期，葡萄牙船隻開始繞經會安往來澳門與麻六甲兩地之後，閩南海商在會安非常活躍。這些陶瓷器，數量達一百八十件之多，是明神宗萬曆年間的產品（西元1590年代），其中約七十件產自漳州，六十件出自江西景德鎮，其餘為廣州和其他地區的產品。而從十七世紀初期起，泉州商人逐漸加進了會安的貿易角逐。特別是荷蘭人在西元一六二四年占領臺灣之後，在會安設立了商館，往返於南海的荷蘭船，常停靠此地；與荷蘭人有貿易關係的鄭芝龍船隊，以及後來繼之而起的鄭成功的商船，更不時往來會安。

西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臺灣納入清朝版圖，有部分明鄭部屬流亡到會安，甚至有一百七十幾人在會安海關任職。因此隨著閩、廣商人的聚集，在會安出現了一個熱鬧的海外華人街。這裡建有觀音廟、關帝廟，還有福建會館、肇慶會館、潮州會館、瓊府會館、五幫會館和客家會館等。相鄰的則是跟隨葡萄牙人船隻南下的日本商人居住的日本人區。在鄭芝龍、鄭成功活躍時期，會安華人多達五千，與當時繁華一時的長崎華人區，南北相互呼應。即使到今天，這裡也還住有一千多名華人，另保留了華人歷史性建築八百多所。<sup>36</sup>



圖二 朱舜水47歲由長崎到越南會安

關於會安城在越南的國家發展史上的區位性，黃蘭翔有所簡述。<sup>37</sup>

西元一四二八年，黎利起兵擊退直接設官統治越南的中國（明朝），他即是黎太祖。一四七一年，黎聖宗南征占婆國且消滅之，會安自此納入

36 前掲書，頁179-181。

37 黃蘭翔：《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8年），頁42-46。明鄉人在越南亦建有會館，稱「明鄉會館」，筆者數年前在胡志明市就參觀過該市的明鄉會館。當然，明鄉人的後裔於今已早歸化為越南人。

黎朝版圖。到一五二七年，黎朝被權臣莫登庸篡奪。黎朝舊臣阮淦擁立黎莊宗於清化、義安一帶抗擊莫氏，一五四五年阮氏死，其婿鄭檢繼之支持黎朝中興大業，檢死，其子鄭松繼之，一五九三年終於光復昇龍城（今河內），迎立黎世宗。在這個鄭氏支持黎朝的過程中，阮淦的兒子阮潢卻於一五五八年率領自己的部眾南至順化獨立，明末到清初時期，越南的河內黎朝（其實是鄭氏政權）與順化的阮朝斷斷續續有戰爭，黎朝較排斥華人，而阮朝卻歡迎華人，因此會安的中國人甚多。

同樣的時代，日本幕府則鼓勵日本商人出海貿易，黃氏在同一書中說明西元一五九三年頒發「朱印狀」給日本西南方面的「大名」和資本家，要求他們的商船到東南亞貿易，因此，日本海商前來會安亦甚為頻繁。

再者，黃氏亦指出明末清初有很多東南抗清志士乘舟泛海到會安，稱為「明鄉人」。<sup>38</sup>這些漂泊到中越安南會安的明朝遺民，基本上，與本文上引的湯錦台所述由臺灣逃至會安的明鄭部曲，他們共同構成了會安地區的抗清復明之華人社會的特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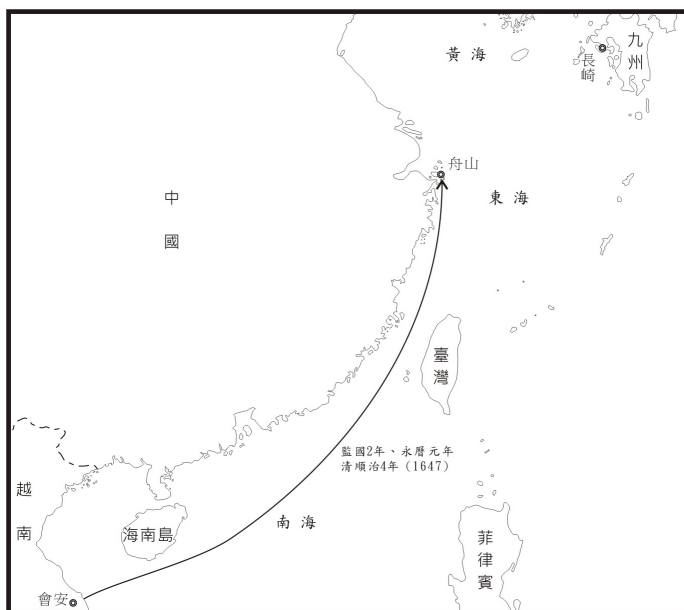
筆者不憚繁引，目的就是結構地詮釋朱舜水所以會航海前往長崎，又從長崎航海到會安之內在原因（外在原因是夏季西南季風可至日本而冬季東北季風可至東南亞之利），乃是會安在那個時代，已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且會安是當時東南亞非常重要的貿易商港，朱舜水亦可依靠之而商貿積貲以備抗清復明之舉，同時會安居留相當數量的抗清華人，如明鄉人或明鄭舊部，亦是吸引朱舜水泛海來此會安城棲留的一個春秋節義之民族認同感。

朱舜水在會安停留至次年，也就是西元一六四七年（魯王監國二年，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他可能是應張名振、張煌言、馮京第等南明魯王政權重要人物之召喚而從會安航海返舟山，見圖三。<sup>39</sup>

38 前揭書，頁51-60。

39 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收入《朱舜水集》，頁656-6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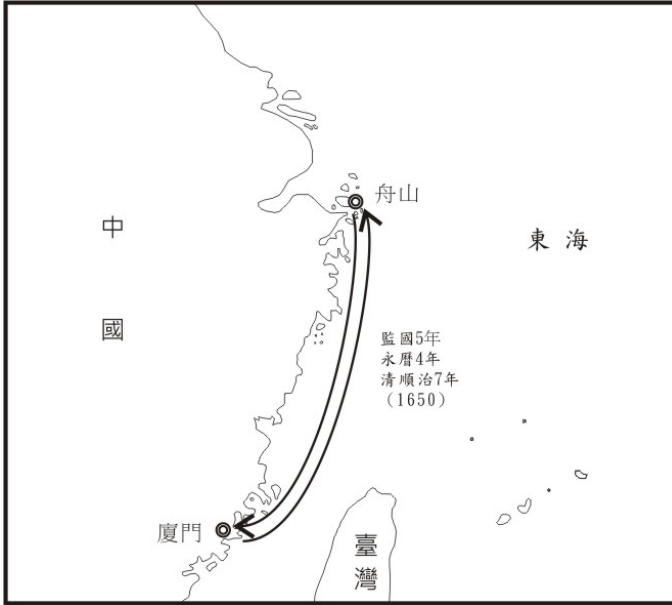
圖三 朱舜水48歲由會安返航舟山群島



圖四 朱舜水50歲由舟山群島到廈門

依梁啟超所敘，朱舜水這兩年都在舟山，而於五十歲時，從舟山浮海到廈門。到廈門之故，或許是試圖為中介而聯合在舟山抗清的張名振、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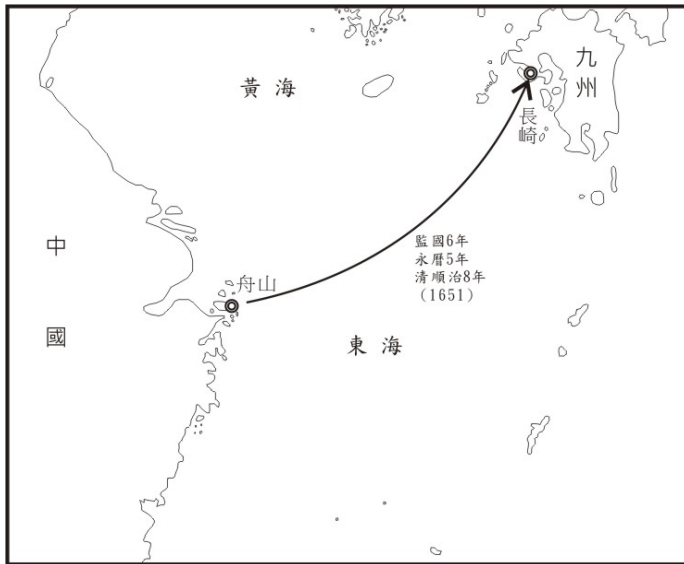
煌言等儒臣和在廈門抗清的鄭成功。<sup>40</sup>也就是說為了閩浙沿海的抗清力量的團結而有的東南海岸的航行，其空間圖示，見圖四。



圖五 朱舜水51歲往返於舟山及廈門

因此，朱舜水五十一歲時期，則於舟山和廈門之間往返不已，蓋或是繼續參與魯王集團及鄭成功集團在東南海上的抗清事業。其時的航海空間圖示，見圖五。

40 朱舜水在東南海上的抗清，主要是支持舟山的魯王，特別與抗清名將王翊論君子之交。在朱舜水的文字和話語中，其實對於魯王政權的一些囂張無度的武人實無好感，似乎對於在廈門抗清的鄭延平之軍伍無秩序，也甚覺可厭，因此似乎沒有前去延平帳下向鄭成功自我推薦。但這一、二年，他是在舟山和廈門兩地航泊往來，其於兩地連繫兩個抗清勢力，或亦有可能。



圖六 朱舜水52歲由舟山到長崎

然而南明的東南海上抗清活動，由於內部紛亂和鬥爭以及相互攻訐殘殺，終究十分窮困艱難。朱舜水五十二歲那年，也就是魯王監國六年（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西元1651年），於六月西南季風興發時，乘舟赴日本長崎。其航海空間圖示，見圖六。

何以朱舜水在舟山和廈門參與海上抗清三年，最終還是決定遠航離去？史實有考。〈舜水先生行實〉曰：「永曆五年辛卯，舟山諸將互抱疑貳，欲相屠殺，清兵將至。先生預料禍敗，欲自舟山至安南，而阻風轉至日本。」<sup>41</sup>這裡說的「欲相屠殺」其實是真正的屠殺，梁啟超提到監國六年「二月，張名振殺黃斌卿舊部將王朝先」。<sup>42</sup>由於激烈的內鬥和互殺，迫使舜水不欲留在舟山而一心求去。

弟子安東守約問：「老師比年在何處？中國喪亂無所住乎？」舜水先回答說他內心不安，欲離此而往日本，並提及兵部左侍郎張煌言勸他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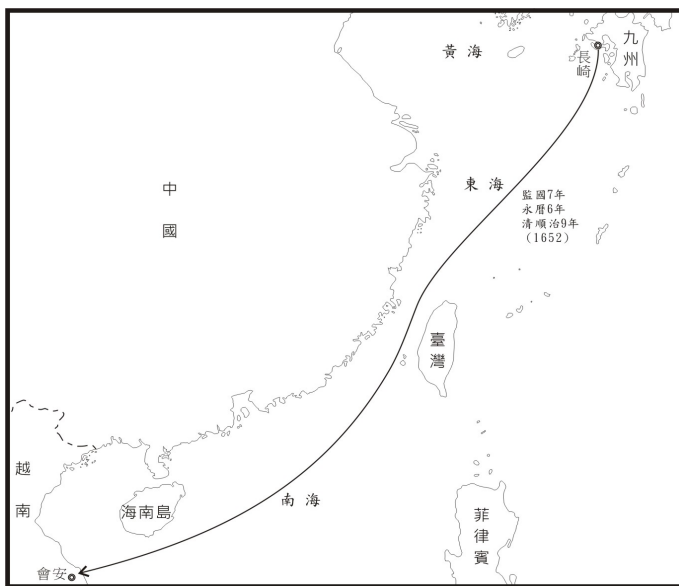
41 〔日〕今井弘濟、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收入《朱舜水集》，頁612-624。

42 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頁661。

走，張氏且說：「我們在此，年翁一人留不住，我們在此作何事？日本人聞之，亦笑我等。」<sup>43</sup>然而，朱舜水終究堅持出離之心志，其理如下：

然不佞不能留也。何故？彼地無田可耕，不能自食其力，此外惟漁亦可。然捕魚舵梢，與盜賊無二，不可為也。若坐而日糜其餉，彼之來者，皆百姓之肉與血，甚者打糧；打糧者，打家劫舍，掠人質子而來物者也。焉有仁人日膳人之肉，膏人之血，食禦人之食，啃人之子之骨而可為者？故決意來此。〔……〕如此剝民，而曰救民，吾弗信也；如此殘民，而圖恢復，吾不知也。<sup>44</sup>

由此可知南明魯王系統的海上抗清團體，平時不事生產，軍隊官吏的吃喝完全依賴舟山的窮困平民支持，除了搜刮自民間之外，居然還有打家劫舍、擄人勒索的惡行惡狀，在朱舜水看來，這哪是抗清復明的義師，其實是個典型的剝削殘害庶民百姓的盜匪集團。不與不義團體為伍而潔身自愛，這就是朱舜水棄魯王朝而遠走日本的緣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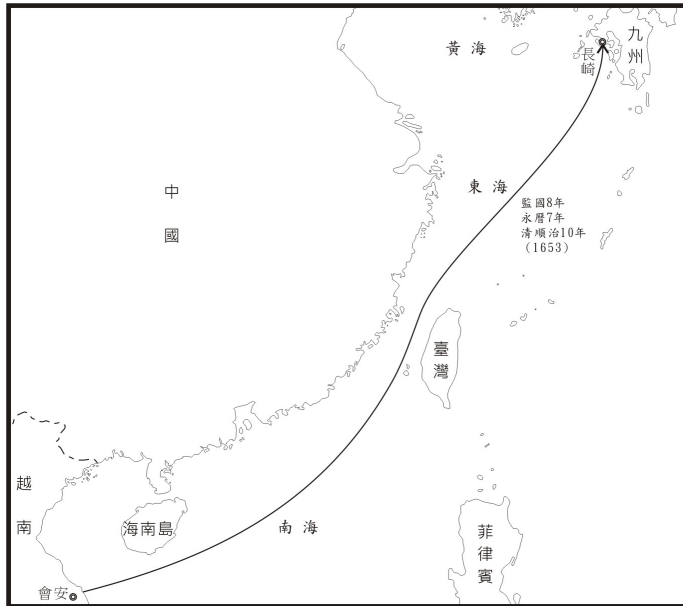


圖七 朱舜水53歲由長崎到會安

43 〔明〕朱舜水：〈答安東守約問三十四條〉，收入《朱舜水集》，頁393-402。

44 前揭書。

五十二歲時的朱舜水航至日本長崎，礙於日本鎖國，無法入境。因此，在東北季風強盛時，乃由長崎南航數年前曾居停的安南阮朝的會安。此時則是西元一六五二年（魯王監國七年，永曆六年，清順治九年）的春夏之際。其航海空間圖示，見圖七。可能是舟航勞頓，朱舜水抵會安後患病甚劇，是時年五十三歲。



圖八 朱舜水54歲由會安到長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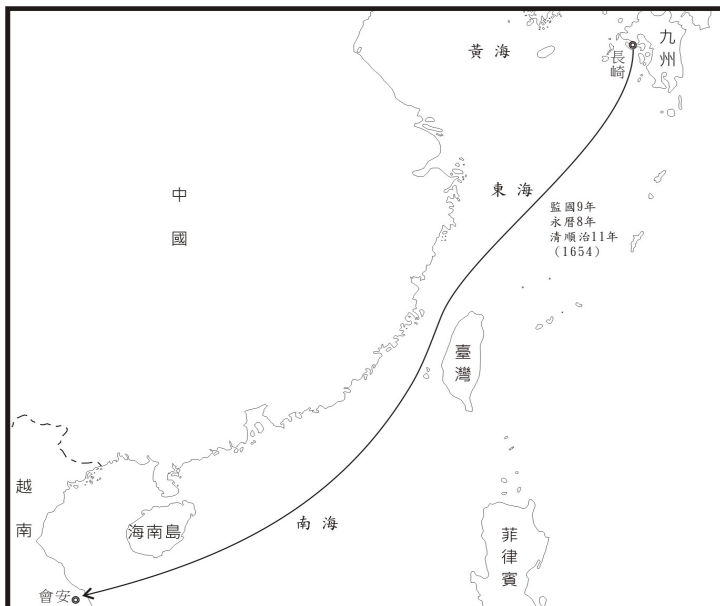
一六五二年秋天，朱舜水又從會安買舟赴日本長崎。他何以再度風波飄搖航行於東亞海洋？似乎是試圖在日本借兵。朱舜水曰：

夫東武固材賢之藪，而璣璧之淵也。吾素聞日本國如古燕趙之風。燕趙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今悲歌之聲形震吾耳、溢吾目久矣。其亦間有慷慨之士乎？有則子為我告之，無則為我博訪之也。其有若黃金五百斤買駿馬之骨，來千里馬者三乎？其有若振垂絕之弱燕，殄二萬乘之強齊，返磨室之鼎，植汶篁之竹者乎？其有立義不侵，然諾為行，不使人疑之田光先生乎？〔……〕其有邯鄲旦夕且下，平原束手擣舌，而義不帝秦，欲蹈東海，若魯連先生者乎？仲連非趙

產，客於趙而能使趙焜煌至今，真人傑也！〔……〕又聞此地多博聞強識之士，胸羅今古，足以匡其君而華其國者，有則亦以告焉。恨吾匏繫於此，不能一觀其盛。儻能身接之，亦足以慰十七年之饑渴，而自信其耳目。〔……〕<sup>45</sup>

舜水在這一段信函中表露了兩個重點，其一他認為日本真乃正義豪傑之國，或有基於義氣而能支援他的抗清復明志節而願效法中國古代英雄貞士，與他一齊返中國去對抗滿清夷狄者？其一他實則把自己比擬為義不帝秦欲蹈東海的魯仲連，而其實，他這位南明之魯仲連，確然是義不帝清且真能蹈航東海的儒家豪傑。

然而，畢竟不存在熱愛中國的日本義士。西元一六五四年（監國九年，永曆八年，清順治十一年），正月，時年五十五歲且失望透頂的朱舜水從長崎航返會安。其航海空間圖示，見圖九。



圖九 朱舜水55歲由長崎到會安

45 〔明〕朱舜水：〈送林道榮之東武序〉，《朱舜水集》，頁476-478。

同年八月，朱舜水在會安旅所設奠哭祭四明山抗清名將王翊，私諡曰忠烈，自稱知友。<sup>46</sup>

王翊是在南明魯王朝中為朱舜水唯一衷心敬重的真英雄真漢子。民國大儒馬一浮記王翊有曰：「王翊，字完勳，慈溪人，徙居餘姚。魯王監國，翊與諸生王江同起兵海濱，應江上師。浙東不守，翊說黃斌卿攻寧波，不克。乃入四明山寨居之，有眾萬餘。再破上虞，略天台，徇奉化，拔新昌，卒為清師所執。是時浙東出寨相望，翊號最強，義聲著於遠近。〔……〕」<sup>47</sup>朱舜水是如何看待這位四明山豪傑烈士？舜水曰：

若夫運會元亨，〔……〕又何有忠節之名？所以然者，直忠臣適然之數，到此地位，自然而然，故從容就之耳。〔……〕。世乃有非笑之者曰：「明室無王，普天臣虜，事不可為，無不變貌革心。爾區區一二匹夫，違天衡命，妄言志節，一部二十一史，何處紀載？而乃貿貿焉出此乎！」嗚呼！此何異污泥之蝦蟇，螿蠶為雄；糞壤之蚯蚓，歌吟得志；又何足與之言白黑、較短長哉！草皆莎茅而靈芝顯，水盡魚蝦而蛟龍尊；鷓鴣燕雀比翼而飛，而鸞鳳鶴雛希世而一見；犬羊羆豕，稱群而數，而麒麟騶虞，曠代而間生；理則然也。使忠臣者天下皆是，則忠臣安足貴哉？是以漢之丞相、三公接跡於朝，而蘇武以使臣耀冊。晉之賈、石、裴、張赫奕於時，而嵇紹以侍中傳芳。唐之節義盛矣，最著司農擊笏，睢陽碎齒。宋之敗亡極矣，猶有世傑、秀夫、文山、疊山。然則忠臣者，生於斯世，為於斯世，際遇何時，竭節何時；〔……〕寧可含恨而歿，不可視息而生。<sup>48</sup>

王翊是朱舜水心中唯一的忠臣，他斥譏盈天下皆是向夷狄胡虜屈膝降伏之「蝦蟲犬豬」之類，何足知忠義烈士的高潔志節？朱舜水於此一方面歌嘆亂世中的「正君臣之大義，嚴夷夏之大防」的「春秋規範」有如希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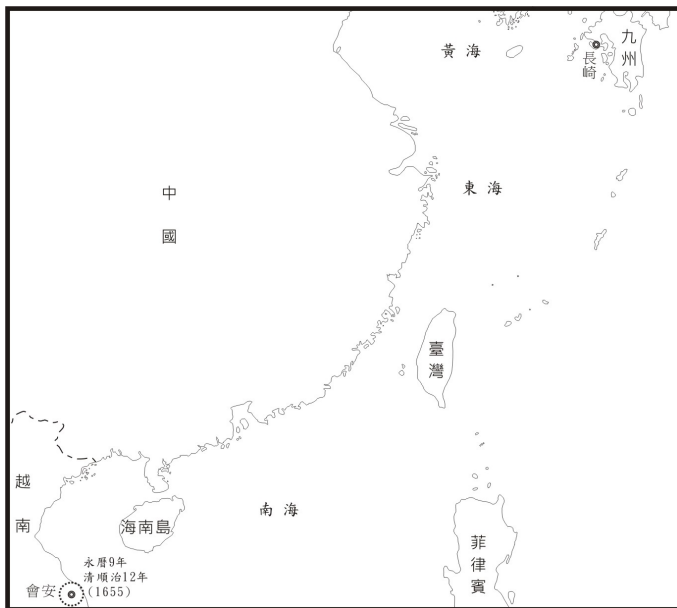
46 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朱舜水集》，頁667。

47 馬一浮：〈（朱舜水）祭王侍郎文三首·案語〉，《朱舜水集》，頁584。

48 〔明〕朱舜水：〈祭王侍郎文三首（二）〉，《朱舜水集》，頁587-588。

珍，同時一方面也藉稱美忠烈之臣王翊而隱曲地向世人宣稱自己乃是大明的忠義儒家。

由於東南海上抗清復明的忠貞之士幾乎零落殆盡，王翊之殉國，使朱舜水心灰意冷，因此其五十六歲時期，均在會安渡過。此停棲越南的空間圖示，見圖十。



圖十 朱舜水56歲在會安

西元一六五六年（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朱舜水五十七歲，是年，他本意返國，以意外之梗，折返會安。<sup>49</sup>

海上抗清事業的局勢實在無望，但是朱舜水在東亞海域仍然如此奔波艱難，何以如此而為？他自己這樣說：

辛卯年七月，預避虜難，從舟山復至安南。累年急欲歸親，多方未遂。每恨衣帶之水，邈焉河、漢。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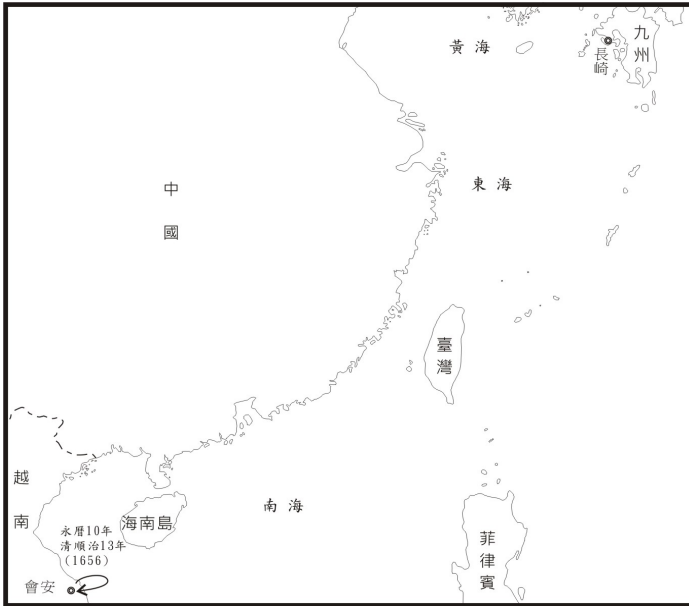
49 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朱舜水集》，頁6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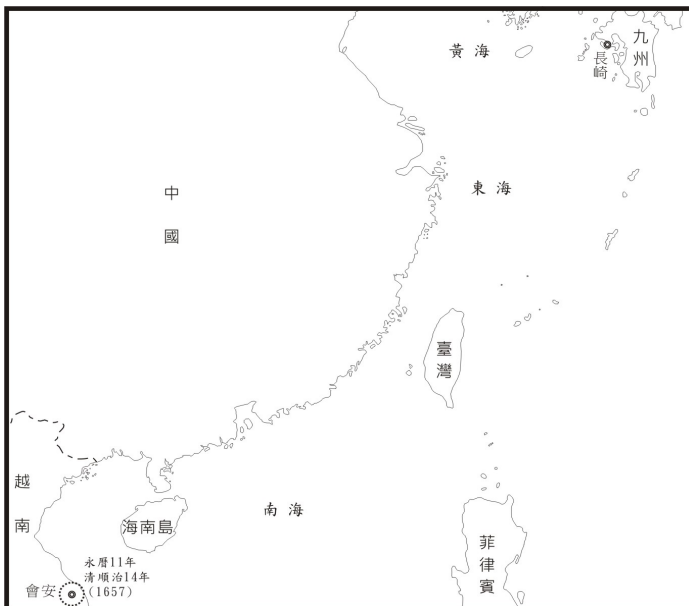
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陳哀曲（筆者按：指晉見魯王）。臣數年海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姦人為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收安南，憤結欲結。〔……〕臣此時已促裝，擬於二十一日往暹羅，亦輾轉以求達也。因暹羅更在西南，誠恐主上未察臣苦心，疑為營私背旨，故捧敕驚懼，即止不行。<sup>50</sup>

從本文前章知悉會安是當時東南亞海域十分繁榮的商港，有歐商、華商以及日商，金融經濟相對繁華興盛，朱舜水多年旅居於此，究竟依賴什麼維生？他是餘姚、松江人士，前者在錢塘江杭州灣區；後者在長江口南岸，就是今日的大上海區，兩者都是航海出洋通商經貿的最佳區位，舜水既為布衣，又生於斯地，再加上熟習航行，更又旅居會安和長崎，他從事貨殖生財，應該相當合理合情，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他所言「數年海外經營以報朝廷」之意思，可能就是小有貲財可以用來購買武器、軍糧……等。再者，會安是明鄉人以及海外抗清之明遺臣避難之地，可以預料朱舜水或許也與這些抗清的明朝人士有所連繫而思推薦於魯王。復次，朱舜水計畫遠航暹羅，何也？當必亦是進行貨殖以及借道泰國前往西南永曆之南明朝商議聯盟共同抗擊滿清有關，而或許是魯王害怕桂王之與其相爭正統，而有所勸阻，故朱舜水被迫取消暹羅行規劃，又復次，他原本已經整帆出港，卻為奸人設圈套而折返會安，其原委或者亦不難明白，就是甚有可能被擁護支持清廷的華商或是清廷派駐當地的人員阻斷其支援抗清而返舟山之舉。此段出航未果的空間圖示，見圖十一。

50 〔明〕朱舜水：〈上監國魯王謝恩奏疏〉，《朱舜水集》，頁31-32。



圖十一 朱舜水57歲由會安出航返國中途折回會安



圖十二 朱舜水58歲在安南被無故羈留於會安五十日

西元一六五七年（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該年二月，朱舜水突然被安南國阮朝官員繫捕，在會安地區羈留了五十天，日日生命交關，

但從死囚身分逐漸轉變成越南人君臣敬仰的中國大儒，其歷程，朱舜水撰述了〈安南供役紀事〉一文加以敘論。<sup>51</sup>此段生涯的空間圖示，見圖十二。

朱舜水在安南國無故被拘捕羈留五十天之後獲釋，在會安的寓所早被偷盜一空，其遭逢的困頓艱難，在其上監國魯王的奏疏中有極為深刻的描述：

昔蘇武尚有一李陵為知己，臣之孤苦何可勝言！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齶肉菹肝，夷風慘刻，惟以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為鴟鵂犬豕之所咀嚼。〔……〕<sup>52</sup>

此中所言乃舜水被拘繫時，安南國官吏一連十天在他面前屠殺罪徒，其狀甚殘忍無人道，欲藉以使其心懼臣服因而對安南國王行跪拜大禮。但終無法讓朱舜水屈服。他依然以大明朝為天子上國而自己是大明之儒士來維持自己的尊嚴。他又說：

使臣目送歸舟，血枯腸斷。沉資裝俱竭，肘見履穿。僮僕遁逃，伶仃孤苦，肌膚憔悴，遣日如歲。若至明年此日，誠恐雞骨支離，久填溝壑，況能光輔主上，大業中興！<sup>5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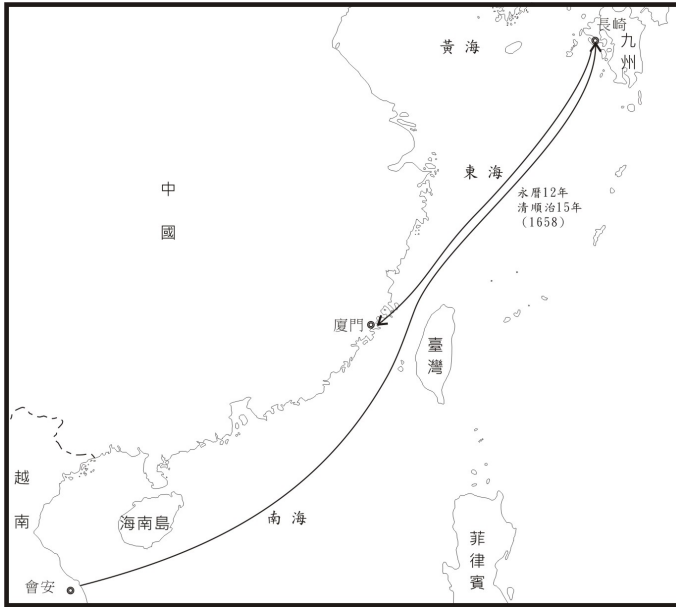
在安南國受辱拘繫於會安的命運，令舜水幾乎已是身心俱病而已到窮乏饑殍而死的狀態，在如此慘境，仍然不忘抗清復明，每見舟船北航而已卻無法歸返，痛苦萬端如「血枯腸斷」。幸好於次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五八年（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他五十九歲的時候，終於可以買舟於夏天西南季風盛吹之際揚帆離開會安遠赴長崎。此空間動線見圖十三。

51 〈安南供役紀事〉收於《朱舜水集》卷二。其內容呈明朱舜水以大明大臣的身分與安南阮朝君臣之間的衝突以及舜水逐漸受到尊敬之歷程。筆者當另為文析論舜水此段遭遇及其回應中堅持的文化意志形態。

52 〔明〕朱舜水：〈安南供役紀事〉，收於《朱舜水集》，頁14-34。

53 〔明〕朱舜水：〈上監國魯王奏疏〉，收於《朱舜水集》，頁33-34。

然而，朱舜水依然困守舟中無法登上日本土地。梁啟超說就在這年十月，九州柳川的年輕儒者安東守約已久聞朱舜水大名故千里間關前來長崎問學，執弟子禮，安東氏乃朱舜水在日本講學的第一位學生。<sup>54</sup>據梁氏考證，也是在十月中旬，舜水受鄭延平王之召，乘東北季風已發而離開長崎前往廈門，欲追隨國姓爺揮師北伐。<sup>55</sup>此空間動線亦見圖十三。



圖十三 朱舜水59歲由會安到長崎再到廈門

朱舜水在廈門寫了一封書函給安東氏，這封書函就是他對日本人講授儒學的開端。其中有曰：

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然而亙千古而未見者何？〔……〕正以不學故耳；不學則執非禮以為禮，襲不義以充義，雖上智容有過差，況其下焉者哉？<sup>56</sup>

54 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收於《朱舜水集》，頁674。

55 前揭書。

56 〔明〕朱舜水：〈答安東守約書三十首·一〉，收於《朱舜水集》，頁169-170。

此段話語是朱舜水對日本人的批評，他指出日本亦是神明庇護之國度，有甚多人才雅儒吉士，但是千古以來卻一直沒有降生如孔、顏、堯、舜一般的聖王聖人，乃是因為「不學故耳」，不學者何？實即不學儒家之道也。他說「執非禮以為禮，襲不義以充義」，是特別有所指的，因為舜水出航日本的那個時代，日本的佛教佛學盛行，儒學相較依然不那麼流暢，或者可以說佛是凌駕於儒之上而廣為社會上下階層信奉，而孔孟之道卻沒有那麼盛行。朱舜水這封給予以後成為日本一大儒者安東守約的書函，可以稱之為中國儒家在日本傳揚孔孟之道的第一聲。

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西元1659年），朱舜水六十歲，在廈門。史家孟森說永曆十二年（西元1658年）秋天，鄭成功興師北伐，張煌言以義師會。陷樂清寧海等邑，比次羊山，不幸猝遇颱風大作，沈巨艦百餘，延平王和煌言廢然退兵。這年冬天，清兵已迫滇都，永曆一路奔亡，十三年（西元1659年）更窮途末路而逃入緬甸。<sup>57</sup>際此危殆的時節，朱舜水或有可能在廈門鄭延平王的軍中。孟森再說到鄭成功和張煌言為牽制清軍，遂於五月攻長江，抵京口，奪瓜洲，圍鎮江，大敗清軍，清廷為之大震，煌言甚至一路光復四府三州二十二縣。然而延平王提師迫金陵觀音門，卻過於輕敵，中清將之緩兵之計，中其夾擊，大敗而潰，棄而歸，永曆十四年（西元1659年）三月離廈門進取臺灣。<sup>58</sup>朱舜水在鄭軍北伐階段，雖在鄭軍之中，卻始終沒有與鄭延平謀面，因為他認為鄭成功治軍不嚴，必無法成大事，對此朱舜水有其深憂和嚴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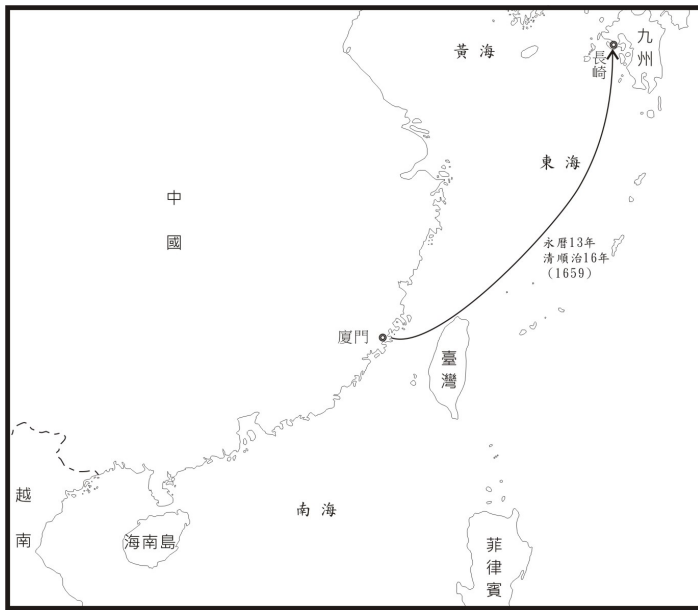
藩臺（筆者按：指鄭成功）不以推賢進士為務，則是興復之志不堅，而立業之基不廣。志切興復，而棄賢才，是涉大川去舟楫也，何以濟哉？〔……〕廿三日，鎮江開門納降，市肆不易。然而紀律時有未嚴，上情不能下究，有識早已憂之。從陸無救焚之策，候風有師老之虞。藩臺似謂虜在目中，徒使英雄頓足耳。七月初八、九，至南京，其下驕而不戢，渙而不萃，中有一二要人，剛愎貪忌，狃

57 孟森：《明代史》（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修訂本），頁391。

58 前揭書。

於小勝，不用上命。〔……〕遂爾一敗至此，雖死何足以贖罪！  
〔……〕民心思漢之誠，於茲大驗，一旦辜負之若此，直可大慟！<sup>59</sup>

依上所言，鄭延平的軍紀敗壞且他本人又不免驕傲而輕敵，再加上屬下一些將領品德甚劣。因此乃大敗潰輸，從此再無力量在大陸反清復明，有負引頸思漢的黎民百姓。朱舜水絕望透頂，遂於永曆十三年乘船離開廈門而再去長崎。此次去到長崎，朱舜水就再也沒有生回中國矣。見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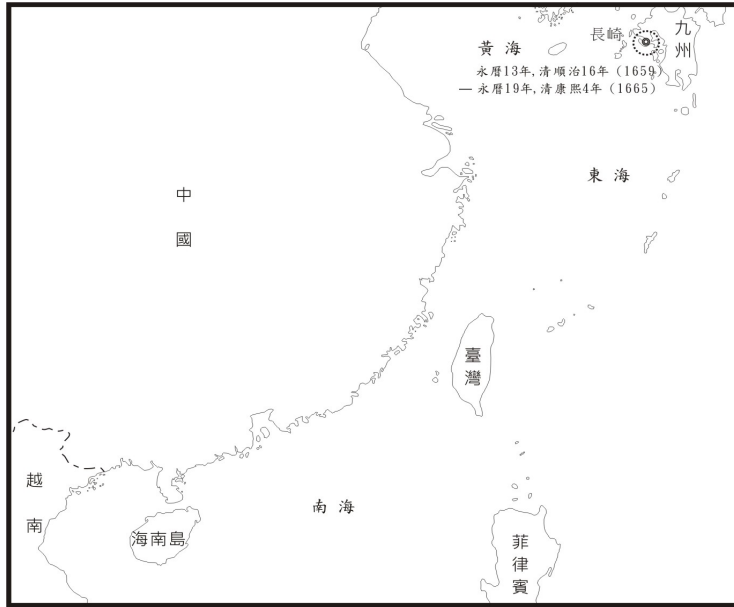


圖十四 朱舜水60歲由廈門到長崎正式居留該地

朱舜水對鄭延平絕望而遠走長崎，那年冬天，安東守約特別為了朱舜水可以安棲於日本而奔走努力求執政當局破例允准朱氏留居。如果未能准許，明年夏初，依法，朱舜水仍然被迫必須離開日本，屆時他怎麼會有一寸地可以棲息？終於因為安東氏的盡心竭力，感動長崎鎮巡黑川正直，由黑川氏的建言，促使佐賀小城藩主鍋島直能協助，朱舜水終獲長崎居住權。這是在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西元1660年）的事，那一年朱舜

59 〔明〕朱舜水：〈與安東守約書二十五首·一〉，收於《朱舜水集》，頁153。

水六十一歲，已是「耳順之齡」的白髮蒼蒼的老儒。從此年起到六十六歲，朱氏一直居住在長崎。見圖十五。



圖十五 朱舜水從60歲至66歲一直滯留居住於長崎

關於朱舜水之獲准在長崎居住的史料，任公考之詳矣。謹依其提供線索加以陳明於下：

日本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僕之留於此，出之黑川丹波守之意，稟白御老中，稟之上旨而後得留於此，非容易也。<sup>60</sup>

黑川丹波就是長崎鎮巡黑川正直。朱舜水有致鍋島氏的信：

某罹中原大故，適貴國以求全。私謂貴國幅員廣大，物產富饒，必有賢明之君，必有好義之主，古道鑑衡，必將庇佑。是以不謀家人

60 [明]朱舜水：〈與小宅生順書三十六首·七〉，收於《朱舜水集》，頁301。

婦子，子身長往，適當嚴禁，逋播去來。昨年果蒙破格留止，慰藉加隆。<sup>61</sup>

由此可證白御老中乃鍋島的大臣「老中」，換言之，安東守約努力陳情，黑川正直又予推崇，再由白御老中的了解認識，於是鍋島藩主十分欽敬，因此，朱舜水破例得以獲得外國人居留長崎權。而在此函中，舜水表達了他心中認定了日本乃是有賢明之君好義之主的君子文教之國家，換言之，雖然日本在中國人的認知中乃「東夷」之海上島國，由於日本彼時並無入侵中國之戰爭，固然東南海上曾有海上倭人對沿岸城鄉之騷擾和殺伐，可是畢竟這些倭人並非日本幕府或諸藩的正規軍隊之侵華，且日本遠自唐時既已派出遣唐使以及許多留華學生和僧侶，久受華化，所以，朱氏並未將東夷之日本視之為夷狄，相對於女真八旗之入關滅明之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日本在朱舜水心目中實乃文明教化的有道君子國也。

在另一封與鍋島氏的信中，我們也看見彼時日本諸侯的好學與惜才之風。因文較長，故分段以明之。他首先說：

去冬承命以下川三省見委，此子溫厚淳謹，僕望其大有所成，此為下僚之子，而臺下能知其可教，即閭閻無遁情矣。是臺下之明也；其父力薄，不能教其子，而臺下事事為之經營，且使其俯仰無虞，得以專志於學，是臺下之仁也。世誠不乏英才，但未有仁明之君如臺下者，故多棄之泥塗之中耳。<sup>62</sup>

鍋島必風聞朱舜水德學深厚，故遣其屬臣年輕人下川三省前往拜師學習。舜水贊美下川氏人品溫厚淳謹，於此看出日本藩國中年輕人亦有虔敬而慕道向學者，以朱舜水的嚴於觀人而能稱美下川氏，可知日本應多有青年人才。再者，此下川氏出身貧寒，鍋島以諸侯之尊竟能不論僚屬之低微出身，能出力照拂培育之，實為仁賢之主上，較之明末一大批昏君，包括雖

61 〔明〕朱舜水：〈與鍋島直能書三首・三〉，收於《朱舜水集》，頁70-71。

62 〔明〕朱舜水：〈與鍋島直能書三首・一〉，收於《朱舜水集》，頁69。



不昏卻甚剛愎不仁的崇禎，故舜水感觸特深，乃發自內心之誠而頌揚鍋島氏。朱舜水又說：

夫賢才固君國之重寶，而世之諸侯守相，金錢溢於府庫，幣帛腐於封椿，或者耽悅玩好，或者馳意聲色狗馬，至於培植人才，則不肯落其一毛，臺下如此舉動，固一世之豪也。〔……〕

〔……〕僕撫之如慈母，而督之如嚴父。〔……〕僕生平一無他長，祇此好善惡惡之心，切於肺腑。〔……〕<sup>63</sup>

此句前面所言統治階層之貴族的貪腐，豈是說日本國？朱舜水實是斥罵明朝的昏君貪官污吏，同時也指責在高位者只有貪鄙之心而吝於為國培養人才，相較之下，在日本國只是一個九州島上的藩主就能如此惜才愛才，在舜水飽受國難風霜摧殘的命運下，乃真正肯定日本國中真有豪傑之雄也。因此，舜水承諾必以儒家仁義之道來教育下川三省。而下川氏似乎是安東守約之外朱舜水定居長崎收入門下的第二個弟子。

依梁編《年譜》，朱舜水在長崎，接受安東一半薪俸以生活。其心情對於明朝之興復已經絕望，既受如此禮遇，多年來的漂泊之生命和心靈，終於在日本出乎想像地獲得了敬重和溫馨的慰藉，因此舜水的身心乃能於老年之齡而可安頓於海外異邦。他在給安東氏的一封信中如此說：

不佞之意，但欲覓數畝之地，住此灌園，頗足自給。不交王侯，不涉世趣，亦自高尚。賢契來則與尚論古人，考究疑義，酌酒談心，更無餘事。如此則科頭敝衣，閒閒十畝。萬一有貴公長者枉車來顧，則飯脫粟，摘園蔬，笑談半日，亦有佳致。<sup>64</sup>

63 前揭文。

64 〔明〕朱舜水：〈答安東守約書二十五首·九〉，收於《朱舜水集》，頁159。

舜水在父母家邦時期，本來就不屑於出仕為官尋求世俗富貴的，在日本長崎萬難之中得能獲得居留，亦只是尋找一小片可耕可耘的土地和得以避風雨的小屋舍，在田園式的隱耕生活中，亦得與德行高貴的安東守約相約定聚會談學論道，如果有貴客來訪，亦只是如朱熹在武夷精舍與弟子們一起以粗菜淡飯進食。<sup>65</sup>貴客依其儉樸清淡之道而共食之，則可與論道，否則正如沒有「隻雞樽酒」就陷害朱子的大奸佞胡紘，何必來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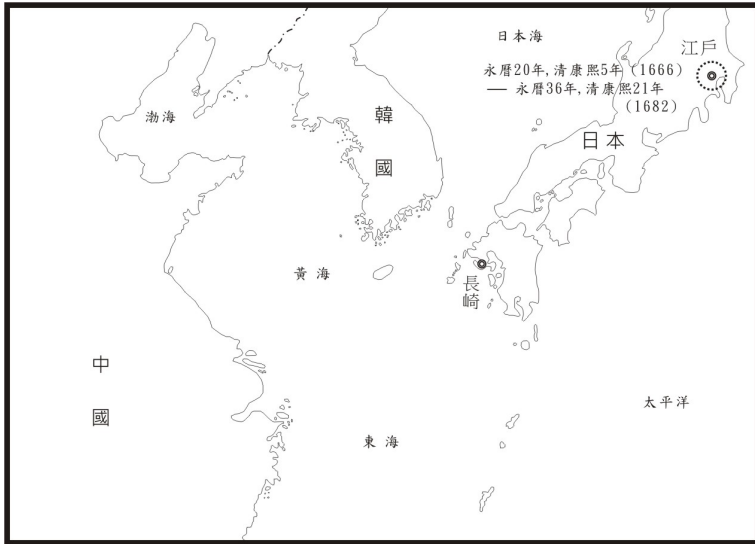
顯然，朱舜水這一個隱居而「耕道」的心願是遵從陶淵明的典範的。「灌園」一詞出自陶詩。陶淵明有詩曰：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  
 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好，云胡以親？  
 我求良友，實觀懷人。歡心孔洽，棟宇惟鄰。<sup>66</sup>

65 關於飯脫粟之句，以朱舜水是堅貞不變的朱子學的實踐者之角色，典故應出自朱子在武夷精舍講學生活的清貧儉樸刻苦之生活寫照，所謂「脫粟飯」是也。脫粟飯若無誤解，應該就是僅脫去稻殼而還留有胚芽穀糠等較粗之成份的粗米，也就是我們現在稱呼的糙米吧？此種米因為粗糙，較難下咽，為富戶和一般人不喜，而是貧窮人家的米食，但它卻較營養較健康。朱子晚年遭奸人迫害，居然也與脫粟飯有關，王著《朱熹年譜》的『慶元二年丙辰（西元1196年）六十七歲』條中的「冬十二月，落職罷祠」款如此說：「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榜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聞之，知舉葉、倪、劉等奏論文弊，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大學》、《中庸》之書，為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卑。臺諫洵洵，爭欲以先生為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久之，姦人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為察官，紘以稿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從之。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管道州。善類重足以立。《宋史·胡紘傳》云：『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亡去。及是，為監察御史，遂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見〔清〕王懋竑：《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56。

66 這首詩不短，筆者不擬全部徵引，讀者可參閱〔東晉〕陶潛：〈答龐參軍〉，《陶淵明集·詩四言》。陶詩題為〈答龐參軍〉的詩有兩章，一是四言之詩，另一是五言之詩。龐參軍曾經是陶淵明的好鄰居，後來搬離了。

朱舜水企求有一塊小小土地，可以供他種種時蔬，可以安隱平靜地棲居，這個所謂「灌園」，就是他以中國最高貴的田園大詩人陶淵明為楷模而想在日本也能成為亦儒亦道的貞亮潔淨之高士。



圖十六 朱舜水從67歲至83歲辭世一直在日本江戶

朱舜水終於前往江戶，受德川光圀的禮聘。<sup>67</sup>任公在《年譜》中說：「小宅生順既東返，重以黑川正直之薦，於是源光圀請於朝以禮迎先生，命長崎鎮巡島田守政專員護送。先生與門人數輩議其去就，僉曰：『上公好賢嗜學，宜勿辜其意。』〔……〕乃決行，六月下旬，先生發長崎。」<sup>68</sup>此年是明永曆十九年，清康熙四年（西元1665年），舜水六十六歲。從永曆二十年，清康熙五年（西元1666年），舜水六十七歲起算，他一直在德川光圀的護持尊養下，在江戶（東京）以日本國之賓師的高貴身分而生活

67 德川光圀（1628-1700）並非幕府將軍，但是「卸三家」中最重要之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其父是第一代水戶藩德川賴房的次子，亦是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的孫子。史家極稱美光圀，朱舜水對之亦非常推崇。而朱舜水在日本受到王者師之禮遇，並非來自幕府將軍，乃是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之重儒重文而尊禮者也。見錢明：《勝國賓師：朱舜水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97-214。

68 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收於《朱舜水集》，頁705。

著，到永曆三十六年，清康熙二十一年（西元1682年）以八十三的高齡與世長辭，在江戶渡過十六年的安穩厚實而受世人尊崇的晚年。<sup>69</sup>

在江戶，朱舜水的南明遺民大儒的生命發生了直接教化日本執政階層的作用。其最主要的影響落在德川光圀，筆者謹引若干段落說明於下。他在江戶生涯的第一個元旦，寫了八篇文章作為祝賀新年之禮給光圀。在第一篇中，舜水先徵引《禮記·禮運》的孔子之「大同說」，<sup>70</sup>然後他說：

瑜居恆讀此書，慨然興歎曰：「吾安得身親見之哉！」然而不能也。茲幸際知遇之隆，私計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為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以今正當有為之時，萬一玩日愒月，謙讓不遑，以至於耄耋期頤，庸有及乎！不幾虛此大美之業、賢聖之姿耶？<sup>71</sup>

這句話不能看成是朱舜水對德川光圀的奉承討好。而是一段包含了兩層意義的話語。其一顯示在當時日本乃以佛教為興盛，而儒家之道於政道上，並未純備，而光圀以英年之姿，卻能甚積極重視國家之道宜以儒學為中心，故舜水趁勢欲以儒道進勉光圀真能實踐。德川光圀雖非將軍，可是卻是能夠實質影響日本政教的實力型領袖，證諸以後發展，朱舜水的儒家理

69 其實，朱舜水既受水戶藩德川光圀的禮聘，其居停自然是在水戶藩之領域中，即今茨城縣，在東京（即江戶之東北方），但由於光圀在江戶亦有其辦公之官舍，所以朱舜水當然也常在江戶，換言之，朱舜水在光圀身邊倍受尊崇的晚年，是於水戶和江戶之間往來，說他在江戶講學論道，乃取一個較重要的城市言也。

70 見《禮記·禮運》：「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不過，朱舜水在其文中所述大同說，與上文有些許出入，舜水之文如是：「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其不幸不全於天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纖慝盡閉，至理聿臻；故外戶而不扁，質實而無偽，是謂大同。」見〔明〕朱舜水：〈元旦賀源光圀書八首〉，收於《朱舜水集》，頁113。

71 前揭文。

想，真能產生深刻作用。其二則是呈現了朱舜水開放性的民族主義，彼時，中國已是女真滿清的天下，舜水恨視殘滅明朝的滿清為「夷狄」，亦即所謂「野蠻民族」，相反地，同樣在中國史中被視同「東夷」的日本島國，則由於其長久以來從中土吸取了漢字、佛法以及儒學，再加上日本國對舜水的優容厚待，所以，他的確興發了日本可為大同治世的信念，於此可見朱舜水心中的華夏和夷狄觀並非狹隘而封閉；若能實踐孔孟儒家王道仁政，就是華夏；若是相反，則是夷狄。<sup>72</sup>

而在日本儒者本身，亦有一種奇特的觀點，即是他們秉持儒家信念，認為日本實行儒家之道，所以「中國」是「華夏」，而不是夷狄，換言之，縱許孔孟仁道思想是創發於中土，但如果在其土地上沒有實行仁政、沒有推展儒教，則根本不配稱為「中國」或「華夏」。而日本雖然只是儒家思想的引進之國，卻有資格和內容自居為中國華夏。<sup>73</sup>

力既足以實行仁政，舜水建議光圀行仁政的重點為何？不外如下所述：

仁政之大端，莫先於養老。〔……〕由此而興孝、興弟不倍，誠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書稱文王能養老，天下莫不聞，東海之濱興曰：

72 朱舜水視用武力殘殺人民強行入主中國的滿清為夷狄，他其實亦深恨腐敗墮落的明朝，在其〈中原陽九述略〉一長文中，痛陳明朝腐敗靡爛因而亡國的滔天巨罪，舜水的語氣，實已嚴厲斥責這一大批明朝腐朽不堪的君臣，是為夷狄。該文收於《朱舜水集》，頁1-13。

73 黃俊傑在其書中指出日本儒者多有以日本為「中國」，也就是視日本為「華夏」的例子，這些日本儒者之所以有此信念，主要乃是因為他們認為真能實踐儒家王道的國家不是地理上的那個中國，而應該是落實在東瀛之島國的日本，所以日本儒者本身就有日本為中國的信念，不獨朱舜水為然。見黃俊傑：〈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中的兩種張力〉，收於氏著《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年），頁131-162。又見黃俊傑：〈日本儒學中的《論語》：與《孟子》對比〉，收於氏著《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年），頁69-106。在黃氏其他論文中還有這方面的敘論，並可參照。

「西伯善養老。」北海之濱興曰：「西伯善養老。」而究其所以，不過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而已。<sup>74</sup>

惟望上公推廣此心，惠澤加於百姓，老者得所養而安，少者有所長而懷；至於與邦人交而止於信，此上公固有之明德也。足其衣食，革其故俗，如此則人人在於覆載之中，人人胥慶，〔……〕<sup>75</sup>

伏以治道有二，教與養而已。養處於先，而教居其大。蓋非養則教無所施，此奚暇治禮義之說也；非教則養無所終，此飽食暖衣，逸居無教之說也。故教者，所以親父子，正君臣，定名分，和上下，安富尊榮，定傾除亂，其效未可一言而喻也。<sup>76</sup>

以上引述三段舜水送光圀的話語，如孝弟之道、老者得其尊養少者得其長懷，以及富而教之之方，統統出自《論語》和《孟子》。換言之，光圀敬聘舜水而尊養之，在舜水看來，光圀豈不就是德川日本的「文王」？因此，舜水亦即是「太公」矣，而甚至亦可類推為「周公」，其大功用實於制禮作樂者也。基於此種期望以及自信，舜水建言的重心是勸光圀在日本推行孔孟之儒教。

依《年譜》，永曆二十四年，康熙九年（西元1700年），舜水七十一歲。先是聽聞光圀有興儒家學校之志。舜水甚重視，在長崎旅居時就有函給安東守約，茲引其內容如下：

聞貴國京江戶有設學校之舉，甚為喜之！貴國諸事皆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欠得？今貴國有聖學

74 〔明〕朱舜水：〈元旦賀源光圀書八首·第二〉，收於《朱舜水集》，頁114。

75 〔明〕朱舜水：〈元旦賀源光圀書八首·第四〉，收於《朱舜水集》，頁115。

76 〔明〕朱舜水：〈元旦賀源光圀書·第六〉，收於《朱舜水集》，頁115-116。

興隆之兆，是乃貴國興隆之兆也。自古以來，未有聖教興隆，而國家不昌明平治者。

近者，中國之所以亡，亡於聖教之隳廢；聖教隳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所以興矣！<sup>77</sup>

在這一段話語中，朱舜水說出兩件關於文教重要性的大事，其一是指責明朝之所以亡，是亡於「聖教隳廢」。明朝是八股取士最發達的時代，讀四書五經藉科舉考試而躍升龍門變成大官的秀才進士，不知凡幾，然而養出大批慵儒、卑鄙、貪婪、腐朽的官僚階層，這樣的文人體系撐不住明朝，它與暴君、奸奄合流，此股黑暗勢力讓明朝拱手將中原大好江山讓給了新興朝氣的女真族。然則，明朝發達的科舉取士之儒教，在舜水的心目中，當然不是真正的「聖教」，其深惡而嚴斥，並非孤例，與舜水同一時代同一區域的大儒黃宗羲亦有非常深刻真切的批判，就科舉取士之弊而言，黃氏曰：

其（按：指明朝）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即其黜落而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sup>78</sup>

黃氏之意是說豪傑之士若是被迫套在明朝科舉取士的牢籠裡，以他們的弘大心志和生命氣象，如何能夠在八股機括中得其所哉？必然落第深山而永

77 〔明〕朱舜水：〈答安東守約書三十首·第十四〉，收於《朱舜水集》，頁183。

78 〔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取士下》，收入沈善洪（主編），吳光（執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冊，頁16。

遠無法為國家、天下所大用。而弔詭處，則是熟習八股機括的庸妄之輩卻可循此公式而通過科舉混入公門，依此投機之路充塞於朝野要津，相互盤纏腐壞國事。

如梨洲所斥責科舉之敗壞聖學且破毀國家之深罪，舜水亦有深論：

明朝以制義取士，〔……〕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豔，何取淵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採詞華，埋頭咕嚕，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以剽竊為工，掇取青紫為志，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既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臨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sup>79</sup>

舜水所言八股科舉之嚴重弊害，與梨洲之論甚有共識。而另一位同時的遺民大儒顧亭林也說到明朝取士的會試以考試官二員為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於其中分房閱《詩》、《易》、《書》、《春秋》、《禮記》等考卷。因此，世上坊間遂有各色十八房命題的「參考書」、「考古題」流行販售，曰：「程墨」、「房稿」、「行卷」、「社稿」等，於是天下士子都人人跳到這個漆膠桶中去追求舉業的榮華富貴。亭林曰：

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丘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昔閔子騫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為必不得

79 〔明〕朱舜水：〈中原陽九述略·致虜之由〉，收於《朱舜水集》，頁1-4。



顯業於帖括，而將為坎軻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  
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sup>80</sup>

亭林直率地點出明朝的八股科舉之毒害，讓天下士子及其父兄老師，都淪落陷溺為下流人。亭林道出的這個現象，正是舜水所說「聖學隳廢」的情狀，當然，就是明朝亡國亡天下的終極原因。此種亡國亡天下的大罪，不僅僅暴君權奄以及奸佞要擔負，實則全天下的淘淘鄙俗的儒士以及他們的沒有志節的父兄師長，都是難辭其罪，都罪不可逭。

然而，朱舜水所稱的「聖學」，並非直接相關於科舉，他之核心義是關心學校教育，所謂「聖學隳廢」，實指明朝的學校制度和內容的腐敗而言。關於此點，黃宗羲亦有痛論。其文較長，但須分段詳加引之：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sup>81</sup>

宗羲指出學校的主旨不僅僅培養天下士而已，其更重要的目的在於養出儒士的「詩書寬大之氣」，敢於承當道統之神聖天責，而能依據仁義之理來批判、指導統治者的政統，從學校發出大是大非的聲音和力量，促使統治者不敢為非作歹而能真確地實行王道仁政。黃氏言下的學校其實除了是教育機構之外，更具有知識分子發其宣揚關心政治社會之輿論以及行其監督糾正政府行政之對錯的功能。而其實這樣的學校功能，本來就是孔孟的主張。

80 〔明〕顧炎武：〈十八房〉，收於《日知錄》（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頁471-473。

81 黃宗羲：〈學校〉，出自《明夷待訪錄》，收於《黃宗羲全集》，頁10-14。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榮之，則群趨以為是；天子辱之，則群撻以為非。簿書、期會、錢穀、戎獄，一切委之俗吏。時風眾勢之外，稍有人焉，便以為學校中無當於緩急之習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鬻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於草野之間，於學校初無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sup>82</sup>

自帝王專制的秦以降垂兩千年，天下已無客觀理性之公理公論，因為一切黑白是非的標準完全出自專制的帝王。天下儒仕均變為迎逢專制主子的唯唯諾諾之奴才，在全國各地第一線上治理統治人民的人員淪落為無學無才無德的俗吏，而所謂「學校」，則完全萎頓敗壞成八股科舉之機括，而徹底喪失儒家的仁義精神和內容。然則，自宋以至明的書院，是否有其發揚傳續聖學的功能？黃宗羲這樣說：

於是學校變而為書院。有所非也，則朝廷必以為是而榮之；有所是也，則朝廷必以為非而辱之。偽學之禁，書院之毀，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爭勝。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與，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於害士，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與？

〔……〕其（按：指明朝）所以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

嗟乎！〔……〕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失教，猶勢利以誘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則吾誰欺！<sup>83</sup>

82 前揭文。

83 前揭文。

黃宗羲在此實以明廷迫害東林而痛責統治集團。由暴昏之君、奸奄以及佞臣結合在一起的明朝統治集團之價值標準正好是與儒家書院的孔孟精神相對反的，在暴君奸臣的迫害下，莫說書院無法存在，連學校亦已廢毀，明朝的儒士君子死難逃離而善類一空，此「不仁之甚」也。

朱舜水所說到的「聖學隳廢」，實應作如是觀。而此亦正是明之所以亡國亡天下之故。

基於上言，舜水與亭林、梨洲一樣，深痛於明的自毀孔孟教化，所以在日本既受優待，就一心期盼光圀建學校興聖學。他的根本理念在給加藤明友的信中呈現出來：

〔……〕若以貴國為褊小，為東夷，謙讓不違，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為之尚有餘裕。昔者滕壤褊小，不能五十里，一旦舉行學校，猶且未能究其實功，而學士大夫至今猶嘖嘖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失今不為，後必有任其咎者矣。<sup>84</sup>

顯然，舜水是孟子學者，他直接引孟子之言來說明日本興立儒學的意義。滕文公嘗問治國之道於孟子，孟子啟示滕文公，滕地雖小，一樣可以施行仁政。孟子告之以兩個步驟，首先是為民治產，黎民富矣，就須教民以仁義，只要確實行養民教民的仁政，地小之滕國必能為王者。<sup>85</sup>舜水實以孟子自任而力勸日本執政階級不宜以日本為褊小東夷之土，而宜正視自己是物產豐饒的大國，不推展聖學以實踐王道之仁政，則更待何時！

84 朱舜水：〈答加藤明友書二首·第一〉，收於《朱舜水集》，頁73-74。

85 《孟子》載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孟子先告訴文公民事不可緩，而一般人民之為道乃「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如果人民無恆產，就不會有恆心，那就易「放辟邪侈，無所不為。」所以，為國者首先必須減稅收且行井田之制來讓人民富足。富之後，就「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見《孟子·滕文公·第三》。

不獨有偶，同一個時代，視入主中國的滿清為夷狄的鄭延平王，於西元一六六一年率領士農工商以及軍人渡海驅荷而遷於臺灣，其大臣泉州儒士陳永華亦於次年延平薨後力勸世子鄭經在臺南「建聖廟，立學校。」<sup>86</sup>鄭經同意，遂在臺南首建聖廟立太學，這是臺灣儒學儒教的開啟，垂四百多年，其功深矣。與陳永華一樣的儒家心志，舜水漂泊異域，並不把日本視為夷狄，且認為土廣物豐人醇，正是建聖廟立學校以推展發揚孔孟聖學的好地方好時機。朱舜水又曰：

至若以風物禮義為歉者，則建學立師，乃所以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何歉焉？惟期銳志而行之。僕生於越而貫於吳，周之東夷也，擯而不與中國之會盟者也。斷髮文身，侏離椎結，以禦蛟龍魑魅者也。僕荒陋不足數，然自漢以來，文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吳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sup>87</sup>

向舜水問學的日人加藤明友認為日本乃屬一個「風物禮義為歉」的無文教之邦，換言之，若依中原華夏的觀點，即東夷之國是也，如何有資格推行儒家聖學？舜水直言而勸，認為正因為如此，所以更要「建學立師」來推展儒學儒教，而正依學校的儒家教育，必能令日本人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之義，而皆忠君愛國、移風易俗而歸於醇厚敦篤之仁義之邦。舜水於日本是有厚望焉，同時，在此處也顯現了他的開放系統的民族主義；孔子曾表示「欲居九夷」，<sup>88</sup>又曾規劃「乘桴浮於海」，<sup>89</sup>孔子居然說出這樣的話語有這樣的欲圖，那就表示他本來就不以春秋諸國為唯一行仁的國度，換言之，孔子並不以當時的中原華夏為僅有的實現仁義理想的地區，他並

86 〔明鄭〕陳永華曰：「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求人材以相佐理耳。今臺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醇；使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何愁徧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材。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引自〔清〕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大通書局，未刊年份），頁236。

87 〔明〕朱舜水：〈答加藤明友書二首·第一〉，收於《朱舜水集》，頁74。

88 《論語》載：「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見《論語·子罕篇》。

89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見《論語·公冶長篇》。

無後世的封閉型之民族主義觀念，所以，「九夷」亦是足可實踐王道之處，浮海去東瀛而行仁道，也未嘗不可，只要有適合的航船就可前往。朱舜水的說法，其內在的信念根本就源於孔子，譬如以吳越之地而言，春秋時期豈不野蠻落後原始？然而歷經儒學儒教的普被浸溉，今日的吳越之文風德教，有哪個地區足以與之比肩抗衡？舜水之意思就是指明日本縱許是「九夷」，是海上的荒島，只要實行孔孟之道，就將是文風德教盛行普及之吳越，而舜水潛意識則儼然以自己為「乘桴浮於海」而「居九夷」的「今之孔子」來自我期許。

於是德川光圀心悅誠服地照朱舜水的理想來推展其儒政，據《年譜》，清康熙十一年，明永曆二十六年（西元1672年），在水戶的學宮築造落成，光圀敦請舜水制〈釋奠儀注〉，舜水率儒學生行之，此年舜水七十三歲。

此之後，朱舜水就在江戶養老講學為光圀之賓師。康熙二十一年，永曆三十六年（西元1682年），朱舜水八十三歲，春之四月十七日辭世，德川光圀親臨治喪，葬一代大儒於日本國常陸久慈郡太田瑞龍山。

## 肆、結論

朱舜水的民族志節有兩個大標準，一是「正君臣之大義」，一是「嚴夷夏之大防」。前者使他終身不仕明廷，因為明朝政治極端腐敗凶險，依史說，舜水出離逃海，實因避南明弘光朝奸黨之追緝迫害，其離開舟山的魯王廷，亦是無法認同魯王廷文武諸臣以及軍紀之敗壞。舜水認同的乃是跳越有限的政權而上升到無限的文化華夏之道統，此即貞信孔孟儒家常道而通過此常道去支持肯定在人文禮制和精神中的中國。後者使他終身反清抗清而以「奴虜」、「醜虜」等貶侮之詞仇視滿清，其基本立論乃因女真以不義之戰殺戮無辜而盜奪天下，孟子說仁君的原則是「殺一不辜奪天下不為」、「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八旗入關襲捲中土，卻是殺天下黎民百

姓而取神器，舜水是最重春秋大義的典型儒者，女真入主中國的行徑，在舜水看來，乃夷狄匪寇，故效法往聖前賢而乘桴浮海飄然遠引。

朱舜水四十六歲開始出離漂泊，一直到六十歲才踏上日本長崎的土地正式定居，長達十五年的歲月在東北亞、中國以及東南亞的海洋上，特別是長崎、舟山、廈門以及會安等四處之間的航路上，動盪飄搖、不遑寧處，所圖為何？其不忘故國邦家的興復，時時以滅清光復為念，故使其以孑然一身之弱軀在滄海中如同精衛之啣水滅火，艱難奔命，其心不死，此等實踐的志節，不在嘴巴上嚷嚷而是真正地身體力行。朱舜水完全表現了道德實踐的真儒家精神。

在「義不臣虜」的民族志節之推動下，朱舜水最終棲居安頓於日本。日本豈非「東夷」乎？然而被中國人久視為「東方之夷」的日本，卻早已是人文國度，她擁有自身的文明政教、社會禮制以及宗教信仰，其中含有豐富的中土東傳的佛家文化和儒家文化。舜水東渡日本，日本儒士和貴族以中土大儒的崇隆規格來禮遇舜水，讓舜水在感懷中提出堯舜孔孟之理想國的實現來期待日本。換言之，在朱舜水看來，華夏之道可在日本實踐，反而宗祖故國的中土卻淪喪為夷狄之邦！舜水的春秋民族大義是人文道德理想主義的開放主義，開放型的民族主義是孔孟原始儒家的基本觀點。◆

## 引用書目

### 古代文獻

〔東晉〕陶潛

〈答龐參軍〉，《陶淵明集·詩四言》

〔南宋〕朱熹

《四書集注》

〔明〕王夫之

1996 《四書訓義·論語》，收於《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第7冊，頁938

〔明〕朱之瑜

1984 《朱舜水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上長崎鎮巡揭〉，《朱舜水集》，頁37-39

〈答古市務本問二條〉，《朱舜水集》，頁378-380

〈答林春信問七條〉，《朱舜水集》，頁383-384

〔明〕朱舜水

〈上監國魯王奏疏〉，《朱舜水集》，頁33-34

〈上監國魯王謝恩奏疏〉，《朱舜水集》，頁31-32

〈中原陽九述略〉，《朱舜水集》，頁1-13

〈中原陽九述略·致虜之由〉，《朱舜水集》，頁1-4

〈元旦賀源光圀書八首·第六〉，《朱舜水集》，頁115-116

〈元旦賀源光圀書八首〉，《朱舜水集》，頁113

〈元旦賀源光圀書八首·第二〉，《朱舜水集》，頁114

〈元旦賀源光圀書八首·第四〉，《朱舜水集》，頁115

〈安南供役紀事〉，《朱舜水集》，頁14-34

〈送林道榮之東武序〉，《朱舜水集》，頁476-478

〈祭王侍郎文三首（二）〉，《朱舜水集》，頁587-588

〈答加藤明友書二首·第一〉，《朱舜水集》，頁73-74

〈答安東守約書二十五首·九〉，《朱舜水集》，頁159

〈答安東守約書三十首·一〉，《朱舜水集》，頁169-170

〈答安東守約書三十首·十四〉，《朱舜水集》，頁183

〈答安東守約問三十四條〉，《朱舜水集》，頁393-402

〈答源光國問先世緣由履歷〉，《朱舜水集》，頁350-353

- 〈與小宅生順書三十六首·七〉，《朱舜水集》，頁 301  
 〈與安東守約書二十五首·一〉，《朱舜水集》，頁 153  
 〈與鍋島直能書三首·一〉，《朱舜水集》，頁 69  
 〈與鍋島直能書三首·三〉，《朱舜水集》，頁 70-71

〔明〕黃宗羲

- 2005a 〈學校〉，《明夷待訪錄》，沈善洪（主編），吳光（執編）  
 《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 10-14  
 2005b 《明夷待訪錄·取士下》，沈善洪（主編），吳光（執編）  
 《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 1 冊

〔明〕顧炎武

- 1970 〈十八房〉，《日知錄》（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頁 471-473

〔南明〕凌雪

- 〈評言〉，《南天痕》（臺北：大通書局，不註出版年份）

〔清〕王懋竑

- 1998 《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清〕江日昇

- 《臺灣外記》（臺北：大通書局，未刊年份）

## 近人文獻

〔日〕今井弘濟、安積覺 Imai, Kōsai and Kaku Asaka

- 1984 〈舜水先生行實〉，《朱舜水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Shunshui xian sheng xing shi," *Zhu Shunshui ji* (Taipei: Han jing wen hua shi ye you xian gong si, 1984)

古清美 Gu, Qingmei [Gu, Ching-mei]

- 2004 《顧涇陽、高景逸思想之比較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  
*Gu jing yang, Gao jing yi si xiang zhi bi jiao yan jiu* (Taipei: Da an, 2004)

朱謙之 Zhu, Qianzhi [Chu, Chien-chih]

- 1984 〈出版說明〉，《朱舜水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Chu ban shuo ming," *Zhu Shunshui ji* (Taipei: Han jing wen hua shi ye you xian gong si, 1984)



- 牟宗三 Mou, Zongsan [Mou, Tsung-san]  
 2003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  
*Cong Lu Xiangshan dao Liu Jishan*, in *Mou Zongsan xian sheng quan ji*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gong si [Linking Books], 2003)
- 何冠彪 He, Guanbiao [Ho, Kuan-piao]  
 1997 《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  
*Sheng yu si: Ming ji shi da fu di jue ze*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gong si [Linking Books], 1997)
- 孟森 Meng, Sen  
 1975 《明代史》（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修訂本）  
*Ming dai shi*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gong si [Linking Books], 1997)
- 東方朔 Dongfang, Shuo  
 1998 《劉宗周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Liu Zongzhou ping zhuan* (Nanjing: Nanjing da xue chu ban she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徐復觀 Xu, Fuguan [Hsu, Fu-kuan]  
 1980 《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  
*Xue shu yu zheng zhi zhi jian*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shu ju [Student Book Co., Ltd.], 1980)  
 1974-1979 《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1979年）  
*Liang Han si xiang shi*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shu ju [Student Book Co., Ltd.], 1974-1979)
- 馬一浮 Ma, Yifu [Ma, Yi-fu]  
 1984 〈（朱舜水）祭王侍郎文三首·案語〉，《朱舜水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Zhu Shunshui) Ji Wang shi lang wen san shou: an yu," in *Zhu Shunshui ji* (Taipei: Han jing wen hua shi ye you xian gong si, 1984)
- 梁啟超 Liang, Qichao [Liang, Chi-chao]  
 1984 《朱舜水先生年譜》，《朱舜水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Zhu Shunshui xian sheng nian pu*, in *Zhu Shunshui ji* (Taipei: Han jing wen hua shi ye you xian gong si, 1984)
- 湯錦台 Tang, Jintai [Tang, Chin-tai]  
 2005 《閩南人的海上世紀》（臺北：果實出版公司，2005年）  
*Min nan ren de hai shang shi ji* [*Beyond the China Seas: the seafaring history of the minnans*] (Taipei: Guo shi chu ban, 2005)

黃俊傑 Huang, Junjie [Huang, Chun-chieh]

2006 〈日本儒學中的《論語》：與《孟子》對比〉，收於氏著《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年），頁 69-106

"Ri ben ru xue zhong de Lun yu: yu Meng zi dui bi," in Chun-chieh Huang, *Dechuan Riben "Lun yu" quan shi shi lun* (Taipei: Taida chu ban zhong xin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9-106

2007 〈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中的兩種張力〉，收於氏著《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年），頁 131-162

"Lun Dong Ya ru xue jing dian quan shi chuan tong zhong de liang zhong zhang li," in Chun-chieh Huang, *Dong Ya ru xue: jing dian yu quan shi de bian zheng* (Taipei: Taida chu ban zhong xin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1-162

黃蘭翔 Huang, Lanxiang [Huang, Lan-shiang]

2008 《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8年）

*Yuenan chuan tong ju luo, zong jiao jian zhu yu gong dian* [Traditional Villages, Religious Architecture and Palace in Vietnam]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ren wen she hui ke xue yan jiu zhong xin Ya Tai qu yu yan jiu zhuan ti zhong xin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2008)

潘朝陽 Pan, Chaoyang [Pan, Chao-yang]

2010 《儒家的環境空間思想與實踐》（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

*Ru jia de huan jing kong jian si xiang yu shi jian* (Taipei: Taida chu ban zhong xin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錢明 Qian, Ming

2008 《勝國賓師：朱舜水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Sheng guo bin shi: Zhu Shunshui zhuan* (Hangzhou: Zhejiang ren min chu ban she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閻振興、高明（總監修） Yan, Zhenxing [Yen, Chen-hsing] and Ming Gao [Ming Kao] (General Supervisor)

1984 《中文百科大辭典》（臺北：百科文化公司，1984年）

*Zhong wen bai ke da ci dian* [Grand Chinese dictionary] (Taipei: Bai ke wen hua gong si, 1984)